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被結構的能動性：犯罪傾向知能結構與暴力行為關聯的跨文化
研究(第2年)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305-067-SS2
執行期間：106年08月01日至107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計畫主持人：陳易甫
共同主持人：吳齊殷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級-專任助理：歐陽以剛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0 月 31 日

中文摘要：近年來，台灣社會屢屢發生重大的暴力刑事案件。以近期女童割喉案為例，受害者家屬的傷痛、加害者家人的歉疚以至於隨之興起的廢死與反廢死的爭論，皆使這個社會陷入精力與情緒上的消耗。然而，真正的問題，即「暴力行為從何而來？為何發生？」，卻鮮少在這一系列的討論中被認真對待。過去研究顯示，暴力行為的起因根植於青少年階段。因此，探討青少年暴力行為的起因甚是關鍵。雖然，過去已有許多社會學與犯罪學的學者針對這個議題進行探究，然而，這些研究大多太過著重單一理論的檢驗或納入多個理論概念卻缺乏整合性的理論思維。這個研究以行動理論的架構重新詮釋犯罪學與偏差社會學新近的整合理論：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以此一理論的核心概念：結構化的暴力知能結構（structured 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來探討青少年暴力行為形成的機制。在未來的三年中，這個研究預計蒐集約1,300位青少年及其友伴的資料，用以針對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進行跨文化的實證檢證。此外，有鑑於該理論在友伴影響力的論述不足以描繪台灣獨特的班級制度，這個研究也提出新增的理論觀點，並蒐集多時間點青少年友誼網絡的資料，用以檢證所提出的理論架構。最後，從行動理論的架構出發，將行動者的能動性與其所處社會脈絡納入理論的思考中，並輔以社會網絡分析的概念，這個研究所得的結果將有助於本土偏差與犯罪學整合性理論的建構。

中文關鍵詞：行動理論、個人能動性、社會基模、暴力知能結構、友誼網絡

英文摘要：As a response to recent violent crimes in Taiwan, whether Taiwan should abandon capital sentence has been a hot topic. Although reform of penal system and human right movement are pressing matters, this line of discussion should go beyond the Versus and investigate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Where the violent acts come from and why the violent acts occur? Pas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etiology of violent behavior roots during adolescence; therefore,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of adolescent violent behavior is critical. Although past sociological and criminological studies have provided empir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 causes of violent behaviors for adolescents in Taiwan, they have only focused on sing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r incorporated multiple theoretical concepts without a cohesive conceptualization. The proposed grant will re-interpret the newly developed criminological theory: 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 from an action theory framework. The researcher will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and causes of adolescent violent behavior with structured 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 a key concept in the 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 In the proposed 3-year grant, 1,300 adolescents and their best friends will be interviewed and empirical data will be obtained. The data will be used to conduct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models. Furthermore, to address the importance

of classroom setting in Taiwanese youths' lives, the research also proposes new supplement to the 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 With the collection of multiple waves of friendship network data, the research will examine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model. Lastly, from the framework of action theory, the research incorporates agency, social contexts, and concepts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result will improve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rime and deviance in Taiwan.

英文關鍵詞：Action theory, human agency, social schema, 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 friendship network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

被結構的能動性：犯罪傾向知能結構與暴力行為關聯的跨文化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305-067-SS2

執行期間：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計畫主持人：陳易甫

共同主持人：吳齊殷

計畫參與人員：歐陽以剛

期末報告處理方式：

1. 公開方式：

☒非列管計畫亦不具下列情形，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2. 「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是

3. 「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 ☒否 ☐是，_____（請列舉提供之單位；本部不經審議，依勾選逕予轉送）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0 月 31 日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 未發表之文稿 ☒ 撰寫中 ☐ 無

專利：☐ 已獲得 ☐ 申請中 ☒ 無

技轉：☐ 已技轉 ☐ 洽談中 ☒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如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請簡述可能損及之相關程度（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以定群追蹤的方法、在兩年的期間追蹤了一群台灣的青少年。結合共同主持人先前執行的計畫，共累積 5 波的長期追蹤資料。最後總計約有 1000 名的台灣青少年具有完整的長期資料。本研究的執行達到了三個研究目的。首先，以美國發展出的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為依據，蒐集台灣本土的經驗證據進行理論的驗證。其次，本研究更延伸犯罪的知能理論，將其後續結合日常活動理論的論述納入，建立更為完整的理論模型。本研究以此為基礎蒐集相關的資料進行理論模型的檢證。最後，本研究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觀點出發，將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與友誼網絡結合，對該理論進行補充。本研究所累積的長期資料將有助於促進台灣犯罪學與偏差社會學未來在理論上的進一步發展，並以此為基礎與國際研究接軌。

被結構的能動性：犯罪傾向知能結構與暴力行為關聯的跨文化研究
Structured Agency: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riminogenic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Adolescent Violent Behavior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台灣社會屢屢發生重大的暴力刑事案件。以近期女童割喉案為例，受害者家屬的傷痛、加害者家人的歉疚以至於隨之興起的廢死與反廢死的爭論，皆使這個社會陷入精力與情緒上的消耗。然而，真正的問題，即「暴力行為從何而來？為何發生？」，卻鮮少在這一系列的討論中被認真對待。過去研究顯示，暴力行為的起因根植於青少年階段。因此，探討青少年暴力行為的起因甚是關鍵。雖然，過去已有許多社會學與犯罪學的學者針對這個議題進行探究，然而，這些研究大多太過著重單一理論的檢驗或納入多個理論概念卻缺乏整合性的理論思維。這個研究以行動理論的架構重新詮釋犯罪學與偏差社會學新近的整合理論：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以此一理論的核心概念：結構化的暴力知能結構（structured 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來探討青少年暴力行為形成的機制。在過去兩年中，本研究蒐集約 1,000 位青少年及其友伴的三波的資料，用以檢證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跨文化效度。此外，有鑑於該理論在友伴影響力的論述不足以描繪台灣獨特的班級制度，這個研究也提出新增的理論觀點，並蒐集多時間點青少年友誼網絡的資料，用以檢證所提出的理論架構。最後，從行動理論的架構出發，將行動者的能動性與其所處社會脈絡納入理論的思考中，並輔以社會網絡分析的概念，這個研究所得的結果將有助於本土偏差與犯罪學整合性理論的建構。

偏差社會學與犯罪學長久以來試圖從不同的理論觀點來解釋暴力行為或犯罪行為的成因。從淵遠長久的社會控制理論（Hirschi 1969）與社會學習論（Matsueda 1988；Akers & Jennings 2015）對於個人所處社會結構與社會情境的重視、重視情境脈絡與機會的日常活動理論（Cohen & Felson 1979），到鉅觀與微觀的緊張理論（Messner and Rosenfeld 2012；Agnew 2005）以及自我控制論（Gottfredson & Hirsch 1990）對於個體特質（trait）差異的重視，學者們不約而同的聚焦於兩個社會學理論的核心：結構與個人。結構觀的理論著重環境的影響力，個人受其社會脈絡的影響，亦或如社會學習理論所論述，透過學習的機制「變壞」，亦或如社會控制理論所述，逃脫社會的常規而進入犯罪行為，又或如日常活動理論認為情境的機會的因素讓個人容易進入犯罪的場域並從事犯罪行為。相對的，持個人觀或微觀的理論著重個人特質在犯罪行為生成的作用力。個人在特質上的差別，如自我控制、動機以至於「犯罪性（criminality）」，皆構成解釋個人犯罪行為的可能因素。此外，微觀的理論更著重這些個人的特質在不同的情境（situation）下是否會有不同的犯罪行為的展現。自 2000 年以後，犯罪學的主要理論皆朝著調和這兩個核心並發展出整合理論（integrated theory）來努力。特別是，相較於單一理論的單一模型全適用（one-model-fits-all）的想法，支持整合理論的學者認為犯罪行為這個複雜的現象並非單一理論可以完全解釋的。

近五年來，Simons 與 Burt 兩位學者試圖從社會學習理論的傳統出發，結合發展心理學與認知心理學的社會訊息理論（social information theory；Baldwin

1992)，發展出一套足以解釋結構與個人因素如何影響個人偏差、暴力或犯罪行為的理論框架：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Simons & Burt 2011, Simons et al. 2014）。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強調個人所處的劣勢環境將人「推入」暴力行為的發展路徑。其中運作的機制有從社會學習理論而來的、有從緊張理論而來的、有的則是從社會控制理論而來的。總之，這些理論機制的運作下使得劣勢環境涵養了個人會以暴力的、衝動的以及有仇必報的待人接物準則，也就是傾向犯罪的社會基模。當個人以此社會基模行事時，就容易產生暴力行為。此外，結合日常活動理論中對於犯罪機會的重視，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進一步預測個人的犯罪社會基模會主動的選擇從事高犯罪風險社會活動以及進入高風險的社會活動場域（risk activities and social space）（Simons et al. 2014），因而增加其涉入犯罪的可能性。

這個研究計畫預計用三年的時間驗證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這個整合性的理論框架對於台灣暴力相關行為的解釋能力。有鑑於文獻中，偏差或犯罪行為的生成以青少年階段為大宗，因此，這個研究將以青少年為研究的對象。過去台灣有關青少年偏差或犯罪行為的研究中，以社會控制理論的論述為最大宗（近期如張楓明 2006；譚子文與張楓明 2013；譚子文、董旭英與張博文 2015）。此外，亦有學者以社會學習理論（陳毓文 1999）以及一般緊張理論（董旭英 2003；譚子文與張楓明 2013）來討論各種因素對於偏差或犯罪行為的影響。晚近，台灣學者開始重視日常活動理論的經驗檢證（張淑貞與李素馨 2008）。這些研究各自從結構觀或個人觀的角度研究台灣青少年的犯罪與偏差行為，這對研究台灣青少年暴力行為的解釋有著重要的貢獻。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如果將這些理論觀點統合起來，並從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的框架出發，是否我們更能夠貼近青少年暴力行為的成因？此為這個研究的第一個提問。

此外，承接這樣的理論探究，當代社會學理論特別著重個人與結構之間的連結。個人能動性（agency）的概念在不同的理論脈絡中皆被賦予連結結構與個人行為之間的關係（Sewell 1992；Emirbayer & Mische 1998）。有趣的是，這樣的理論觀點鮮少在偏差社會學與犯罪學的理論當中被討論到。在前述眾多犯罪學理論不乏強調社會結構對於個人特質的影響。例如，一般緊張理論論述個人所處結構所提供的壓力源（stressor）對於個人負面情緒的提升，進而影響個人採取犯罪手段應付情緒的可能性（Agnew 2006）。社會學習理論則認為個人周遭的友伴偏差程度會影響其偏差意圖以及偏差行為的發生，而社會控制理論更是論及個人所處的社會脈絡對其犯罪行為的控制。這些理論皆已揭示個人犯罪行為受所處社會結構的影響。相對的，一般犯罪理論強調個人特質對於犯罪行為的影響（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修正後的一般犯罪理論則強調自我控制在情境中的理性計算（Hirschi 2004）、Collins（2008）與 Katz（1988）將動機與情緒納入暴力與犯罪行為的解釋中，而日常活動理論（Cohens & Felson 1979）則是注重動機、情境與受害者三者對犯罪行為的貢獻。這些的理論派別不約而同看見個人因素（包括動機、自我控制或情緒）在解釋青少年暴力行為所扮演的角色。若將犯罪行為當成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那麼一個整合型的犯罪與偏差社會學的理论應該回答下列的問題：結構如何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其機制為何？個人能動性又扮演何種角色？如何概念化個人的能動性，用以連結個人所處的結構以及個人的暴力行動之間的關連，將本研究計畫第二個

提問。

其次，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的形成奠基於描繪美國非裔男性日常生活所經歷的情況。其理論的原型在於描繪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非裔美國人在都市中的生活情況。幫派、毒品以及暴力橫生的社區之中，非裔青年如何因著環境以及家庭的劣勢，進而學習街上生存之道（street code；Anderson 1999），亦即犯罪的知能。而如同前述，這樣的知能讓非裔青年傾向於涉入犯罪與暴力的活動當中。這樣的理論原型被 Simons 與 Burt 兩位學者移用並加入認知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元素發展成整合性的理論，用來解釋居住於美國南方郊區的非裔青年的犯罪與偏差行為的生成，因此，證明這樣的理論觀點可同時適用於都市與鄉間的脈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整合型的理論尚未被證明適用於非裔美國人以外族群、美國以外的地域以及文化。本研究的第三個提問即為：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是否能夠適用於解釋台灣青少年的暴力行為？這個研究的成果將提供這個新近犯罪與偏差社會學理論一個跨文化的外部效度檢驗。

雖然，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是從社會學習理論的根源來發展其整合理論的框架，在其理論架構中卻鮮少針對友伴的影響，這個社會學習理論最重要的理論因素，進行有系統的探討。青少年的犯罪或暴力行為並非憑空而來的，其行為鑲嵌在多種的社會脈絡下，其中，友伴關係在過往的文獻中最常被提及，也被認為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Jaccard, Blanton, & Dodge 2005；Kreager, Rulison, & Moody 2011；李文傑 2012）。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在最初的理論建構中，將友伴當作是個人所處的環境與其理論核心——犯罪知能之間的中介變項（Simons & Burt 2011）。此理論認為友伴對於青少年犯罪行為而言是一種脈絡的影響，亦即，青少年所結交的朋友中越暴力或越高比例的犯罪行為，則青少年越容易發展出傾向犯罪的知能與傾向，進而產生暴力行為。然而，在之後的理論發展中，友伴這個重要的因素卻被捨棄在檢證的模型之外（Simons et al. 2014）。以友伴重要性，實在需要將之重新納入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如何將友伴的影響力納入這一個整合性的犯罪學理論，這將構成本研究計畫的第四個提問。本研究將引入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觀點來重新概念化友伴在該理論的位置，使其理論能夠更貼近社會學習理論的傳統。

最後，Simons 與 Burt 兩位學者將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定位為生命歷程的社會學習理論（life-course social learning theory；Simons et al. 2014），闡述個人從青少年早期至成人初期偏差行為以至犯罪行為的發展歷程。從早期個人所處的環境出發，探討犯罪知能在青少年時期的形成機制。當時發展程進入青少年後期以及成年初期時，該理論預測犯罪知能發揮其能動性的特性而能主動的「選擇」場域以及活動，讓個人更容易涉入犯罪的路徑。這是生命歷程的劣勢累積原則（disadvantage cumulative principle）的展現。要檢證這樣歷程，則需要取得橫跨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長期追蹤資料。因此，這個研究將以固定樣本追蹤的設計，持續追蹤一群青少年至他們成年初期。透過，橫跨成長時期個人資料的累積以及友伴網絡的變動情況，這個研究將可以完整的檢證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以及補充其在友伴影響上的遺缺。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具有三個研究目的。首先，透過本土長期資料的蒐集，對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進行跨文化的實證檢證。這個目的除了讓台灣偏差社會學與犯罪學的研究能夠與美國本土理論進行相互的驗證與交流外，也可以增進台灣本土偏差社會學與犯罪學在理論解釋上的豐富性。此外，本研究也將從結構與個人連結的角度重新詮釋該理論，這符合當代社會理論試圖解決結構與行動之間連結的趨勢，期望為本土偏差社會學與犯罪學增添一個新的理論取向。在本研究報告中，將初步的探討該理論核心概念在台灣青少年樣本的測量與對偏差行為的預測效力。

其次，本研究報告將針對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其他的理論預測進行經驗的探討。特別是，在結合犯罪學中的日常活動理論後，該理論預測個人的社會基模對於個人日常活動場域的選擇產生影響。這種選擇性的假設更需要運用長期資料的方式進行經驗的檢證。本報告將運用本研究的三波資料檢證該理論的說法是否符合台灣青少年的現狀。

最後，這個研究的進行也將補充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在友伴影響相關論述的不足。如同前述，本研究依據友誼網絡的相關研究與論述，對該理論進行理論上的補充。此外，透過蒐集多時間點的友誼網絡資料，研究者將針對所提出的新增論述進行實證上的檢驗。由於，在青少年階段以固定班級進行教學以及度過學生生活的情況為東亞國家的特殊性因素，本研究依據友誼網絡理論所提出的新增論述正可以作為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在其發展後續理論的跨文化論述的依據。

三、研究方法總論

（一）樣本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母體為台灣的青少年，本研究特別選擇目前在校的國中生與高中生作為抽樣的對象，這是因為過往的研究發現：國高中階段是青少年一般偏差行為盛行率最高的階段。抽樣方式將台灣區分為北中南東四個區域，以分層叢集抽樣的方式在各區域抽取樣本國高中，然後，再從抽中的學校中隨機選取一至二個班級進行調查，當班級被抽中時，班上所有的學生皆納入研究樣本中。本研究第一波蒐集之總樣本數為 1,627 名學生，國中生為 764 名、高中生為 863 名；男性為 846 名、女性為 781 名；北部 776 名、中部 484 名、南部 215 名、東部 152 名。

共同主持人吳齊殷研究員進行「落霞與孤鶩、秋水共長天：青少年友敵關係同質性的考察與檢驗」研究計畫（後簡稱落霞計畫）。該計畫於 2014 年 8 月開始進行為期三年調查，調查對象為 2014 年 8 月入學之國中、高中與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預計在 2016 年 8 月進行最後一年的調查。本研究計畫將加入該研究最後一年的調查，並針對國中與高中的樣本進行調查，由於先前樣本流失嚴重，在本計畫開始後，研究者增加新學校樣本以填補缺失的樣本數量。更由於本研究經費不足的緣故，不再追蹤東部地區的樣本，詳細的調查時程與樣本數如表 3.1 與 3.2 所示。

表 3.1 調查時程表

	2015	2016	2017	2018
國中樣本(為新增樣本)	國一	國二(國二上)	國三(國二下)	(國三下)
高中樣本(為新增樣本)	高一	高二(高二上)	高三(高二下)	(高三下)
落霞計畫	Wave 1	Wave 2 & Wave 3	Wave 4	Wave 5
本計畫		Wave 1	Wave 2	Wave 3

表 3.2 本計畫樣本數對照表(以本計畫波數為主)

	Wave 1		Wave 2		Wave 3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國中樣本數	384	462	377	350	260	248
高中樣本數	462	401	365	296	305	160
合計	846	781	742	646	565	408
加總	1627		1388		973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研究者參考國外研究、社會基模理論原始測量與過往台灣相關研究的測量編撰問卷。國外測量的部分，在取得原始測量開發者的同意後，進行題目的翻譯與再翻譯（back translation）。研究者依據再翻譯的結果，對題目進行修改。最後，研究團隊將所有的測量編撰成問卷，並選擇國中與高中生各一班進行預試。在預試結束後，研究者亦召集部分受試者進行知能訪問，確定題目的問法與當代台灣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相符。研究者依據預試與知能訪問的結果，再次修改問卷並定稿。研究團隊委外建立了網路問卷系統，將完整的問卷數位化，以利受訪者線上填寫。

(三) 施測程序

本研究接續「落霞計畫」最後一年的調查時程。遵循該計畫的施測程序，在每學期初與樣本學校聯絡並安排施測的時間。研究團隊在約定的時間進入學校，並進行施測。研究團隊會特別請學校安排學生在電腦教室進行施測。但，亦有部分學校由於設備或時程無法配合，研究團隊當場以紙本問卷施測的方式進行。

(四) 變項測量

依據本研究報告的三個研究目的，在此呈現主要的研究變項。

偏差行為 此題組由 17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在過去 6 個月內，你做過下列事情幾次？……」，該行為有考試作弊、竊盜、暴力行為等偏差行為，加總後建立指標分數。

視暴力為合法手段(legitimacy of violence use) 此題組由 14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請問您是否同意下面幾個敘述?.....」，敘述分別為有時你必須用武力或暴力來維護自己的權利、有時你必須威脅他人好讓他們公平地對待你等，選項分數 1 至 4 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對他人敵意態度(hostile view of relationship) 此題組由 12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在過去 6 個月中，當你外出時，你多常遇到以下情況?.....」，敘述分別為你覺得其他人會佔你的便宜、你覺得其他人需要被教訓等，選項分數 1 至 5 為從未到總是發生。

低自我控制(self-control) 此題組由 16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這裡有些可以測量自己的問題，請告訴我下列敘述不符合你個人的情況?.....」，敘述分別為你會去做大部分的人覺得危險的事情，例如：飆車、你喜歡冒險等，選項分數 1 至 3 為完全不符合至非常符合。

對社會常規的漠視 此題組由 9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你認為以下行為在你這個年齡，錯誤程度為何?.....」，敘述分別為意圖把人打傷、偷竊一些價值不高的物品、使用非法藥物等，選項分數 1 至 4 為沒有錯誤至非常不對。

生活型態(life style) 此題組由 7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在過去 6 個月中，在夜晚期間，你多常從事以下活動?.....」，從事活動分別為去酒吧狂歡、去撞球間、去聲色場所等，選項分數 1 至 5 為從來沒有到每周數次。

所處環境的他人視暴力為合法手段之程度 此題組由 6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針對你從事大部分活動地方（例如學校、住家附近）的人，你認為那些人對以下敘述同意程度為何?.....」，敘述分別為有時候必須用一些肢體暴力來捍衛個人的權利、有時候必須威脅他人用以取得他人公平的對待等，選項分數 1 至 4 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鄰里關係 此題組由 6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請問你自己和鄰居間來往的情形大概是什麼樣?.....」，來往情形分別為互相打招呼、閒話家常、談家裡的事情等，選項分數 1 至 5 為從不到總是。第二波本題組題目組成與第一波與第三波有差異，故並未將第二波加入分析。

居住社區失序程度 此題組由 3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請問您同意下列對於你住家附近的描述嗎?.....」，敘述分別為街道上常有空的瓶子、碎玻璃或垃圾、建築物的外牆有塗鴉、有廢棄沒有人住的空屋或店面，選項分數 1 至 3 為很嚴重到不嚴重。

居住社區安全度 問題為「請問您同意下列對於你住家附近的描述嗎?4. 整體來看，住家附近安全程度如何?」，選項分數 1 至 4 為很安全至很不安全。

目睹偏差經驗 此題組由 7 題問題所構成，提問方式為「在過去六個月中，你是否曾在學校或生活周遭看到下列事情發生:.....」，敘述分別為言語恐嚇、武力威脅、破壞公物等，選項分數 1 至 4 為從來沒有至幾乎每天。

家庭衝突 此題組由 9 題問題所構成，選項分數 1 至 4 為非常符合至非常不符合，問受訪者對以下敘述的符合程度：家人彼此間的關係比外人的關係來得密切、家人彼此間覺得很親近、作決定時家人會彼此商量等，計分方式為越高分家庭衝突程度越高。

四、研究發現

本研究報告將集中討論三個互相關連的主題以回應三個研究目的。在第一個主題中，將呈現犯罪的知能結構核心概念—知能結構在三波的資料中的測量情況，並進而討論其預測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效力。第二個主題聚焦於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場域。從犯罪學的日常活動理論出發，本研究報告將探討青少年活動場域的特質如何與其知能結構互動，進而增加其涉入暴力行為的機會。最後一個主題則探討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較為忽略的一個重要的變項—友伴的影響力。透過友伴網絡資料的蒐集，本研究報告將初步的呈現友伴的特質如何影響個人的暴力行為。

1. 描述性統計

表 4.1 為本研究主要變項跨波的描述統計，表 4.2 與表 4.3。從個人知能結構與各項指標的相關係數表看出，對他人敵意態度與自我控制兩項基模與偏差行為、被害經驗及家庭衝突間皆有顯著相關，代表個人越有高敵意態度、低自我控制會有越多的偏差行為、被害經驗與高的家庭衝突，而對社會規範的漠視則未明顯與其他變項有顯著相關。

個人生活模式、所處環境的他人視暴力為合法手段之程度與偏差行為相關係數上看出，生活模式越涉足風險場所者有越高的偏差行為；所處環境的他人視暴力為合法手段之程度越高亦會影響個人有越多的偏差行為。

表 4.1 各波指標分數描述性統計值

	W1 平均數	W1 標準差	W2 平均數	W2 標準差	W3 平均數	W3 標準差
偏差行為	2.05	7.97	1.66	6.44	3.22	15.32
被害經驗	10.75	3.18	10.53	1.90	10.48	1.32
生活模式	7.38	1.32	7.36	1.35	7.39	1.63
鄰里關係	16.66	6.34	-	-	15.93	6.15
居住社區失序程度	3.79	1.51	3.79	1.57	3.51	1.19
居住社區安全度	1.72	.58	1.77	.56	1.73	.62
目睹偏差經驗	8.24	2.89	8.22	2.56	8.54	2.60
家庭衝突	15.24	5.90	15.28	5.75	16.27	6.15
視暴力為合法手段	25.24	8.97	25.99	9.46	27	9.07
對他人敵意態度	20.95	8.13	24.87	8.58	24.39	8.20
自我控制	25.34	3.79	25.53	3.79	25.60	3.81
對社會規範的漠視	31.96	8.32	32.48	7.28	32.94	5.95
所處環境的他人視暴力為合法手段之程度	11.27	4.27	11.52	4.41	11.79	4.17

W1：N=1627、W2：N=1388、W3：N=973

表 4.2 個人知能結構與其他變項相關係數表

	偏差 W1	偏差 W2	偏差 W3	被害 W1	被害 W2	被害 W3	目睹偏差 W1	目睹偏差 W2	目睹偏差 W3	家庭衝突 W1	家庭衝突 W2	家庭衝突 W3
對他人敵意態度 Wave1	.16**	.07**	.09**	.12**	.15**	.19**	.23**	.25**	.25**	.25**	.24**	.18**
對他人敵意態度 Wave2	.10*	.21**	.09**	.10**	.21**	.24**	.20**	.29**	.29**	.19**	.25**	.24**
對他人敵意態度 Wave3	.08*	.12**	.08*	.10**	.20**	.29**	.20**	.26**	.38**	.23**	.29**	.28**
自我控制 Wave1	.22**	.14**	.10**	.08**	.13**	.14**	.13**	.18**	.17**	.21**	.24**	.21**
自我控制 Wave2	.12**	.14**	.10**	.02	.17**	.15**	.07*	.19**	.17**	.22**	.27**	.18**
自我控制 Wave3	.12**	.14**	.12**	.04	.14**	.16**	.08*	.13**	.17**	.22**	.28**	.26**
對社會規範的漠視 Wave1	-.50	-.07*	.00	-.01	-.02	-.02	.00	-.05	-.03	-.01	-.01	-.02
對社會規範的漠視 Wave2	-.04	-.07*	-.08*	-.05	-.09**	-.07	-.06*	-.03	-.07*	-.03	-.01	-.13**
對社會規範的漠視 Wave3	-.12**	-.07*	-.01	-.03	-.04	-.07*	-.07*	-.04	-.04	-.11**	-.08*	-.07*

* $p < .05$ ** $p < .01$

表 4.3 個人所處環境與偏差行為相關係數表

	1	2	3	4	5	6	7	8	9
1.生活模式 Wave1	-	.39**	.39**	.11**	.09**	.07*	.20**	.04	.12**
2.生活模式 Wave2		-	.49**	.10**	.14**	.15**	.14**	.08*	.15**
3.生活模式 Wave3			-	.09**	.11**	.13**	.06	.07*	.23**
4.所處環境的他人視暴力 為合法手段之程度 Wave1				-	.44	.43**	.13**	.06*	.06
5.所處環境的他人視暴力 為合法手段之程度 Wave2					-	.49**	.08**	.15**	.10**
6.所處環境的他人視暴力 為合法手段之程度 Wave3						-	.06	.10**	.15**
7.偏差行為 Wave1							-	.25**	.10**
8.偏差行為 Wave2								-	.12**
9.偏差行為 Wave3									-

* $p < .05$ ** $p < .01$

2. 研究目的一：犯罪知能結構的變與不變

雖然 Simons 與 Burt 兩位學者詳盡地闡述了知能結構在 SST 中所扮演的重要，在他們前後期的作品中對於知能結構的設定卻有些許的不一致。在 2011 年的文章 (Simons and Burt 2011) 中，他們借用了 Hirschi 的自我控制理論與 Bourdieu 的慣習 (habitus) 的概念，來說明知能結構所扮演的角色。而這兩個概念都隱含著一種特質說的論點，即知能結構具有一種習慣性的行為反應、一種穩固的特質持續地影響著犯罪行為。此外，在同篇文章，他們也強調不同人之間知能結構的異質性，即不同的人具有程度高低的知能結構。這樣的論述則隱含著群體異質性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的論述。群體異質性 (Nagin & Paternoster 2000) 即是一種特質說的論述，強調某種特質的分佈決定了犯罪行為的分佈。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知能結構在 SST 所扮演的角色頗符合特質說的論述。

兩位學者在 2014 年 (Simons and Burt 2014) 進一步的闡述了 SST 的理論。在該篇文章中，兩位學者強調 SST 為生命歷程觀點下的社會學習理論。從生命歷程的觀點出發，知能結構在概念上同時具有自我累積、選擇性的性質以及可受個人所處狀態與脈絡影響 (malleable) 的性質。Burt (2017) 進一步的闡釋自我累積與選擇性的過程。她引用人格心理學有關人格特質的連續性研究，來論述知能結構的連續性過程。Caspi、Elder 與 Bem 的兩篇經典文章 (1987, 1988) 中分別探討害羞與易怒的人格特質如何依循著「規避世界 (moving away from the world)」與「對抗世界 (moving against the world)」的生命歷程發展模式而產生其最終的發展結果，有如對「個性決定命運」這句諺語的驗證。Burt 依據同樣的邏輯強調 SST 的知能結構有如人格特質一般會主動選擇適合其運作的社會環境，以達到自我延續的目的。也就是說，早期具有較高的知能結構的個人，會去選擇參與高風險的活動或出現在鼓勵犯罪的場所之中，進一步涵養其知能結構，達到延續性的情況。至此，SST 中的知能結構在論述上頗符合潛在特質的觀點。

然而，在另一個研究中，Simons 與 Barr (2014) 卻強調知能結構的可受影響性。他們從婚姻與犯罪中止 (desistence) 的相關討論出發，論述婚姻之所以能夠中止犯罪，主要在於伴侶之間的知能結構彼此影響的結果。原本具有高知能結構的個人，在遇到低知能結構的伴侶後，改變其知能結構的程度，進而改變了其犯罪的行為。從生命歷程的角度來說，重要的生命事件 (如婚姻、成為父母) 提供了個人重新進入社會控制的機會，而這個社會控制改變了個人知能結構，進而達到犯罪中止的結果。從這樣的論述來看，SST 對知能結構的設定頗符合狀態說的論點。

由於同一個研究團隊 (甚至用的是同一筆資料) 對於知能結構的定位有所不同。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就在於探討知能結構在 SST 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符合潛在特質說的論述，還是較符合狀態說的觀點。本研究跳脫原始研究團隊的資料，利用台灣青少年短期追蹤的資料，為 SST 的論述提供一個獨立的經驗檢證。

本研究將採用前三波的資料進行檢證。在排除未追蹤樣本與變項缺失值

後，本研究的最終分析樣本數為 840 位學生。由於，其追蹤期間約為一年半，屬於短期的追蹤調查。這樣的時間長度頗符合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因為，若在相對短期的時間中，分析結果仍能發現知能結構仍有統計上顯著的變動，其結果將會相對的有效度。

為了探究知能結構的變與不變，研究者首先針對知能結構的三個元素及知能結構進行潛在成長曲線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s）的分析。由於僅有三個時間點，僅能夠探討線性的成長模型。透過對成長參數的估計，研究者可以得知在 1 年半的期間，受訪者在各變項上平均變化情況為何？其變化是否具有個人之間的差距。其次，基於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發現，研究者將進一步針對知能結構進行成長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s）的分析。透過對知能結構成長軌跡的分群，研究者將可同時瞭解受訪者在知能結構上成長軌跡的內部變化與個人之間的差異。最後，研究者依據成長混合模型的結果，分析其他 SST 相關變項與成長軌跡分群之間的關聯。所有的分析皆在 Stata 15.0 與 Mplus 7.0 中完成。

表 4.4 呈現的是各元素與知能結構總分的單一變項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結果。首先，所有模型的模型配適度皆很好，顯示線性模型的足以描述各知能結構的元素與其總分的短期變化。其次，每個變項的平均斜率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顯示平均來看，知能結構在這 1 年半的期間內並沒有改變。此外，在各個元素上，斜率的變異量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顯示在單一的元素上，個人之間的變化亦沒有太大的差異。然而，有趣的是，知能結構的總分雖然其平均斜率沒有顯著，但斜率的變異量卻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顯示其變化存在著異質性。這個發現值得進一步的探討。最後，我們可以從截距的分析結果發現，每個變項的截距變異量皆達到統計上顯著。這顯示在截距上存在著個人之間的差異。也就是說，在第一波時不同人在知能結構及其構成元素上有著明顯的差距。整體來看，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結果較為支持潛在特質的觀點。：起始時間的個人之間具有不同程度的知能結構，而且隨著時間的推進並未觀察知能結構有著改變。

由於前一階段的分析中僅有知能結構的總分的斜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在這個階段將針對知能結構總分進行混合成長模型的分析。表 4.5 呈現模型選擇的過程，可以看到 4 群與 5 群在 BIC 上具有較好的模型配適。由於兩個模型在指標上的差距並不大，基於精簡（parsimonious）原則與避免有過小樣本數的分群出現，本研究採用 4 分群的模型。表 4.6 與圖 4.1 呈現此一分析的結果，而表 4.7 則是進一步的探索這些分群在 SST 架構下相關變項的變異數分析情況。

表 4.4 知能結構及其組成元素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截距	截距的變異量	斜率	斜率的變異量	模型配適度
對人際關係敵意觀	0.105	1.850***	-0.041	0.084	$\chi^2=0.432$, $df=1$, $p=0.5112$ CFI=1 RMSEA=0.00 (CI=0.00; 0.08)
低自我控制	25.579***	9.433***	0.055	0.722	$\chi^2=1.065$, $df=1$, $p=0.3021$ CFI=1 RMSEA=0.01 (CI=0.00; 0.09)
非常規的信念	31.848***	0.549**	7.176	1.798	$\chi^2=0.038$, $df=1$, $p=0.8462$ CFI=1 RMSEA=0.00 (CI=0.00; 0.05)
知能結構	0.178*	4.147***	-0.066	0.379*	$\chi^2=0.743$, $df=1$, $p=0.3887$ CFI=1 RMSEA=0.00 (CI=0.00; 0.09)

Note. CFI = comparative fit index; RMSEA =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 $p<0.05$; ** $p<0.01$; *** $p<.001$

表 4.5 犯罪知能的混合成長模型之模型選擇

配適指標	分群數					
	2	3	4	5	6	7
AIC	-5652.02	-5549.24	-5532.37	-5518.10	-5515.45	-5514.62
BIC (n=2520)	-5669.52	-5575.49	-5567.36	-5561.84	-5567.94	-5575.85
BIC (n=840)	-5666.22	-5570.55	-5560.77	-5553.60	-5558.05	-5564.32

4 群中，只有「持續低下降」這一群具有負的且顯著的斜率，而其知能結構在四群中也是最低的，這一群人佔整體樣本 30.6%。其他三群（「持續低不變」、「持續中等不變」、「持續高不變」）在斜率上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顯示這些群在知能結構上並沒有變動。從圖 4.1 可以看出這三群在知能結構的程度高低上有明顯的差距。這點可以在表 4.7 的變異數分析的事後比較中可以看出，各群在三波的知能結構的程度皆皆有統計上的顯著。圖 1 可以看到中間的兩群（「持續低不變」與「持續中等不變」）分別佔總樣本的 41.8%與 22.5%。其中「持續低不變」的人數最多，而其軌跡的截距與 0 並沒有顯著的差距，表示在標準化的尺度下，這群人與整個分配的期望值並無差異。「持續高不變」這群僅佔 5.1%的總樣本，為四群當中最少人的一群。這群人持續地維持著最高的知能結構。統整混合成長模型的結果，可以發現在短期的觀察下，潛藏特質的論點較獲得資料的支持。然而，狀態說的論述也並沒有完全出局，即使在相對短（1 年半）的時間下，我們仍觀察到一群人在知能結構上有所改變。這群人的存在為狀態說提供一個有力的證據。

表 4.6 知能結構的混合成長模型（四群）

	知能結構的軌跡分群			
	持續低下降	持續低不變	持續中等不變	持續高不變
估計值				
截距	-1.94***	-0.08	2.23***	4.89***
斜率	-0.28***	0.13	-0.10	-0.10
樣本數	257	351	189	43
百分比	30.60%	41.79%	22.50%	5.12%

圖 4.1 知能結構的混合成長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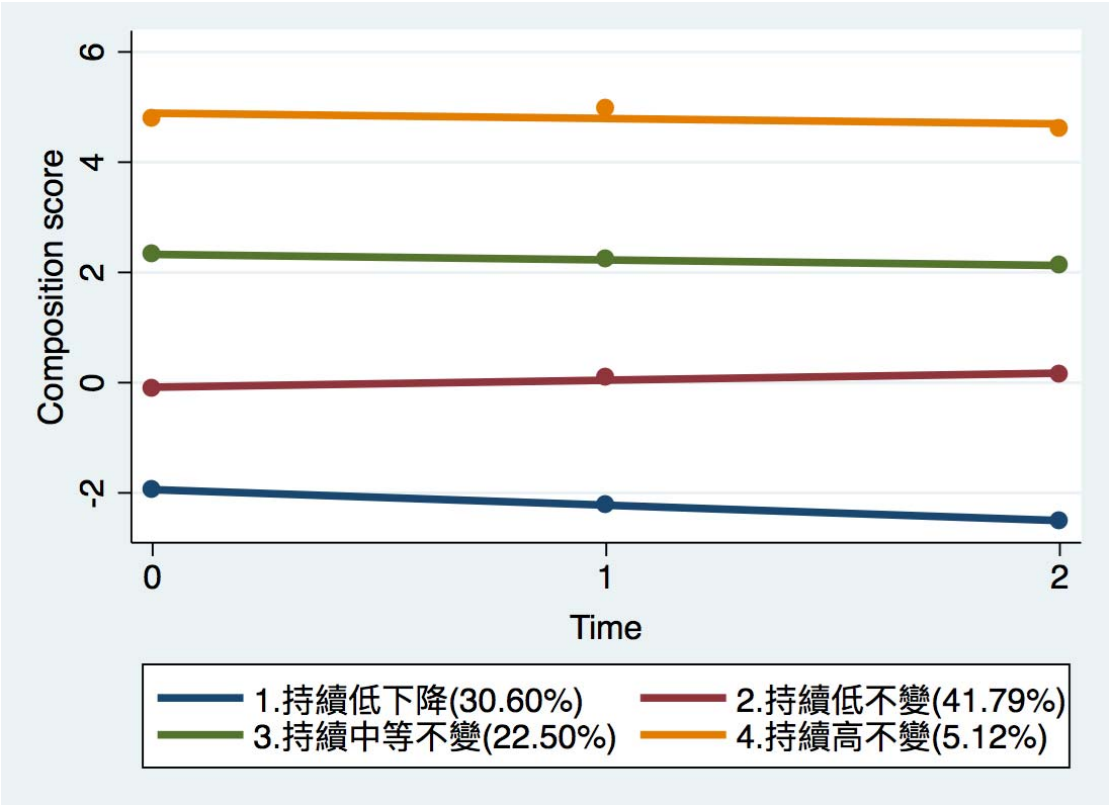


表 4.7 知能結構軌跡分群的變異數分析

	知能結構的軌跡分群				F	事後比較	N
	持續低 下降	持續低 不變	持續中等 不變	持續高 不變			
知能結構一	-2.04	-0.11	2.53	5.06	432.42***	1<2<3<4	840
知能結構二	-2.38	0.12	2.48	5.24	597.29***	1<2<3<4	840
知能結構三	-2.67	0.19	2.29	4.97	543.42***	1<2<3<4	840
憤怒情緒三	18.38	24.25	26.17	30.40	77.83***	1<2<3<4	833
非結構式生 活形態三	11.41	11.88	12.61	13.26	13.31***	1 \cong 2<3 \cong 4	838
偏差行為三	0.57	2.33	3.42	14.65	16.71***	1 \cong 2 \cong 3<4	840

***p < .001

除了各波知能結構在各軌跡分群的差異外，表 4.7 同時納入三個與 SST 相關的變項在第三波的情況。在憤怒情緒上，四群的平均數有顯著的差距。從事後比較的結果可以看到憤怒情緒與知能結構的分佈情況一致，「持續高不變」那群具有最高的憤怒情緒，而「持續低下降」那一群則有最低的憤怒情緒。陳易甫（2017）結合 SST 與一般攻擊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指出憤怒的感知風格有可能成為知能結構的另一元素。這樣初步發現似乎支持這樣的論點。

McNeeley 等人所提出的非結構式生活形態（unstructured lifestyle）在表 4.7 中呈現出各群顯著的差異。從事後比較的結果可以發現兩個低知能結構的群體具有較低的非結構式生活形態，表示這兩群體較少涉入這些具有高風險的場域。相對的，兩個相對高知能結構的群體則有較高的非結構式生活形態。有趣的是兩組在知能結構上有程度上的差距，但在涉入場域卻沒有差別。這表示知能結構與非結構生活形態之間並不完全的對應。

最後，表 4.7 也呈現知能結構的分群跟偏差行為之間的關連。不同的軌跡分群在偏差行為有統計上顯著的差距。事後比較的結果顯示「持續高不變」這群的偏差行為顯著地高於其他三群。這顯示知能結構與偏差行為之間有所關連，然而這個關連發生在少數的青少年當中。其他三群雖然在知能結構上有所差別，但在偏差行為上卻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

從潛在特質論與狀態論的觀點出發，本研究探討晚近犯罪學整合理論 SST 中核心概念—知能結構的變與不變。利用一筆短期的追蹤資料，本研究分析台灣青少年知能結構的短期變化情形。潛在成長曲線模型與混合成長模型的分析結果顯示，台灣青少年知能結構的短期變化情形較支持潛在特質論的觀點。研究發現，在 1 年半的期間，知能結構的三個元素及知能結構的總分皆無統計上顯著的變動，反倒是在起始點上（也就是截距），其平均數顯著地與 0 不同。更重要的是，起始點的變異量具有統計上的顯著。這顯示台灣青少年的知能結構在程度上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情形，但在 1 年半的期間內並沒有多大的變動。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結果中亦發現知能結構在斜率的變異量上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這表示對不同的青少年來說，在 1 年半期間內知能結構的變動可能有所不同。這點發現有可能部分支持狀態論的觀點。本研究利用混合成長模型進

一步探究這個現象，結果發現約有 3 成的青少年其知能結構隨著時間而有所降低，這個發現可能顯示了狀態論觀點運作機制的可能性。然而，混合成長模型的發現主要的發現仍支持潛在特質論的說法。首先，7 成的青少年其知能結構在 1 年半期間並沒有統計上顯著的改變。其次，第一波知能結構的高低排序決定了後面兩波的排序。這兩個結果支持潛在特質說認為特質僅有人群之間的差異而無變化的特性。

雖然在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兩個觀點在與犯罪行為相關的個人特質的預設上有所不同，然而，兩個觀點或許只是在描述不同的現象與人群。發展心理學家 Moffitt (1993) 提出偏差行為類型的概念，指出在犯行的群體中有著兩個本質迥異的犯行者。一群犯行者如同潛在特質論的說法，具有高程度的傾向犯罪特質，而這個特質持續的影響著這群人，讓其不斷地涉入偏差行為之中。另一群人則不太具備傾向犯罪的特質，或雖然具備這個特質但是其嚴重性並不高。因此，這群人會在人生某些時期會因為所處的情境與狀態而涉入偏差行為。然而，由於這群人在傾向犯罪特質的程度較低，隨著情境與狀態的改變，而中止偏差行為。

本研究的發現初步的支持這樣的論述。短期的追蹤資料指出知能結構在 SST 中扮演的角色可能類似潛在特質的角色。這包括該特質的穩定性與個人程度上的異質性。但是，這樣的觀點卻無法解釋為何會有一群人的知能結構在短期中會有持續下降的情況發生。這是否表示 SST 後期引入生命歷程觀點的論述在某個程度上也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持。本研究的進行僅是初步的檢證，未來的研究將可繼續探究這個問題。

3. 研究目的二：青少年活動場域的特質與知能結構的互動效果

古時「孟母三遷」的故事指出了環境對於兒童與青少年行為的影響。這樣的思維具體落實在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預防辦法，即在該辦法中單純出入特定場所而無特別作為就可以構成少年的不良行為，如出入妨害身心健康場所或其他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與深夜遊蕩。這樣的思考顯示出青少年出入的場所 (place) 本身具有實務與理論上的重要性。在實務上，新聞媒體中不時聽聞青少年在特殊場合 (如 KTV、夜店) 或自願或被動地涉入犯罪的情境，顯示這些場所本身具有某種特質，能夠將青少年「推入」犯罪的活動當中。在理論上，從傳統的社會解組理論、日常活動理論乃至晚近更為細緻的場所犯罪學 (criminology of place; Weisburd, Groff, & Yang, 2012)，皆指出青少年所活動的場所直接地影響其犯罪行為的涉入。

雖然在過去的犯罪學文獻中已經有許多的經驗研究支持場所相關的理論觀點 (Bursik & Grasmick, 1993; Sampson, Raudenbush, & Earls, 1997; McNeeley, 2015)，這些研究大多從結構觀的角度探討場所的特質 (如社區的頹敗、社會控制較弱或犯罪機會繁多等) 加諸於個人的推力，使個人容易涉入犯罪行為。然而，這一脈的研究較少討論下列兩個主題。首先，這些理論論述著重在場所結構特質的影響，而較少著重特定場所內行動者所建立的規則。Anderson 在其民族誌的研究中指出特定地區內部的街頭守則 (street code)「鼓勵」著地區內的行動者的進行暴力與犯罪行為。因此，除了場所的結構特質外，研究者應更進

一步的探索場所內守則或次文化的影響。

其次，這些理論論述忽略了個人並不是「一張白紙」似地進入這些場所。不同的個人受到這些場所的影響不盡相同。Simons 與 Burt (2011) 兩位學者強調認知層次的社會基模 (social schema) 對於個人犯罪與暴力行為的影響。個人在其環境中涵養出待人處事的原則。兩位學者提出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 (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 SST) 並指出當個人處於劣勢的環境時，個人傾向從環境中學習那些傾向犯罪的訊息，如以暴制暴、立即滿足與對社會規範的不信任與反叛，並以這套認知基模去定義與處理人際間的互動。SST 引入情境行動理論 (situational action theory; Wikström, 2014) 的觀點，認為具有高犯罪認知基模的行動者，在高風險的情境之下，更容易進行犯罪與暴力行為。因此，前述場所的影響仍需要看個人在認知與詮釋能力上的表現，才算是對個人犯罪與暴力行為有完整的瞭解。

本研究從場所的影響這個觀點出發，結合 Anderson 的街頭守則、Simons 與 Burt 的 SST 與 Wikström 的情境調節論述，以青少年暴力行為為對象，試圖探討場所相關概念與個人認知因素的獨立影響，並進一步探索兩者的交互作用。採用一筆全台青少年的樣本，本研究將針對上述的論點進行經驗的驗證。在此，採用本研究第一波的資料進行探討。本研究分析總樣本數為 1,565 名學生，其中國中生為 752 名、高中生為 813 名；男性為 818 名、女性為 747 名。

在犯罪學的文獻中，犯罪或暴力行為的相關變項通常呈現正偏的分佈，因此，在晚近的研究中，多數學者採用負二項式模型 (negative binomial model) 進行分析 (Simons & Burt, 2011; Long, 1997)。負二項式模型與波以松 (Poisson) 模型類似，皆是適合應用於於依變項為次數 (count) 變項的線性模型當中。相較於波以松模型假設依變項的期望值與變異量須相等，負二項式模型則引進 α 係數來處理此一過度離散 (overdispersion) 的問題，因此為前述犯罪學文獻所青睞而採用之。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兩個研究假設，研究者進行一系列的線性模型。首先，為了探討主要自變項對暴力行為的影響，研究者將 4 個自變項與 3 個控制變項同時放入模型中進行分析。其次，針對暴力知能與場所變項的交互效果的探討，研究者在前一個模型的基礎上，將暴力知能與 3 個場所變項的交互作用項分別放入 3 個模型當中，用以探討兩變項的交互作用對暴力行為的影響。

表 4.8 呈現負二項式模型的分析結果，各個模型的 $\log \alpha$ 達到顯著，顯示負二項式模型優於波以松模型。此外，各模型的模型檢定 (Wald Chi-square test) 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顯示各模型在統計上是成立的。3 個控制變項中，性別與年級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家庭收入並無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男性及高中生表現出較多的暴力行為。模型 1 檢測場所相關變項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涉入較多的風險活動場所、較高的場所守則與較高學校暴力皆與青少年的暴力行為增加有關聯。在模型中其他變項不變的狀態下，青少年每增加 1 個單位的涉入風險活動場所，其暴力行為的發生率 (incident rate) 增加 1.16 倍 ($e^{.771} - 1 = 1.16$)。同樣地，場所守則與學校暴力的增加分別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發生率增加了 0.28 倍與 0.13 倍。這樣的結果支持下列的說法：涉入的場所特質 (即較具風險與暴力盛行的場所) 以及場所的守則 (即該場所盛行著支持

犯罪的規範)與青少年暴力行為有正向的關聯。

表 4.8 負二項式模型：暴力知能與場所變項對暴力行為的影響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調節變項	無	無	活動場所	學校暴力	場所守則
活動場所	.771*** (.202)	0.500*** (0.12)	0.101 (0.21)	0.496*** (0.12)	0.592*** (0.13)
場所守則	.244*** (.043)	0.119** (0.04)	0.138*** (0.04)	0.121** (0.04)	0.074 (0.05)
學校暴力	.120** (.046)	0.131** (0.05)	0.129** (0.05)	0.130** (0.05)	0.143*** (0.04)
鄰里效能	.033 (.064)	0.108 (0.07)	0.094 (0.07)	0.109 (0.07)	0.104 (0.06)
暴力知能	--	0.485*** (0.08)	0.467*** (0.08)	0.489*** (0.08)	0.391*** (0.09)
暴力知能 X 調節變項	--	--	0.179* (0.09)	-0.006 (0.02)	0.054* (0.02)
女性	-2.008*** (.385)	-1.701*** (0.41)	-1.777*** (0.40)	-1.699*** (0.41)	-1.651*** (0.36)
高中生	-1.426*** (.389)	-1.361*** (0.36)	-1.404*** (0.36)	-1.377*** (0.35)	-1.391*** (0.33)
家庭收入	.034 (.057)	0.031 (0.05)	0.032 (0.05)	0.029 (0.05)	-0.012 (0.04)
常數項	1.731 (.954)	0.898 (0.93)	0.993 (0.91)	0.933 (0.90)	0.983 (0.81)
Log(α)	2.855*** (.230)	2.570*** (0.28)	2.550*** (0.27)	2.565*** (0.29)	2.497*** (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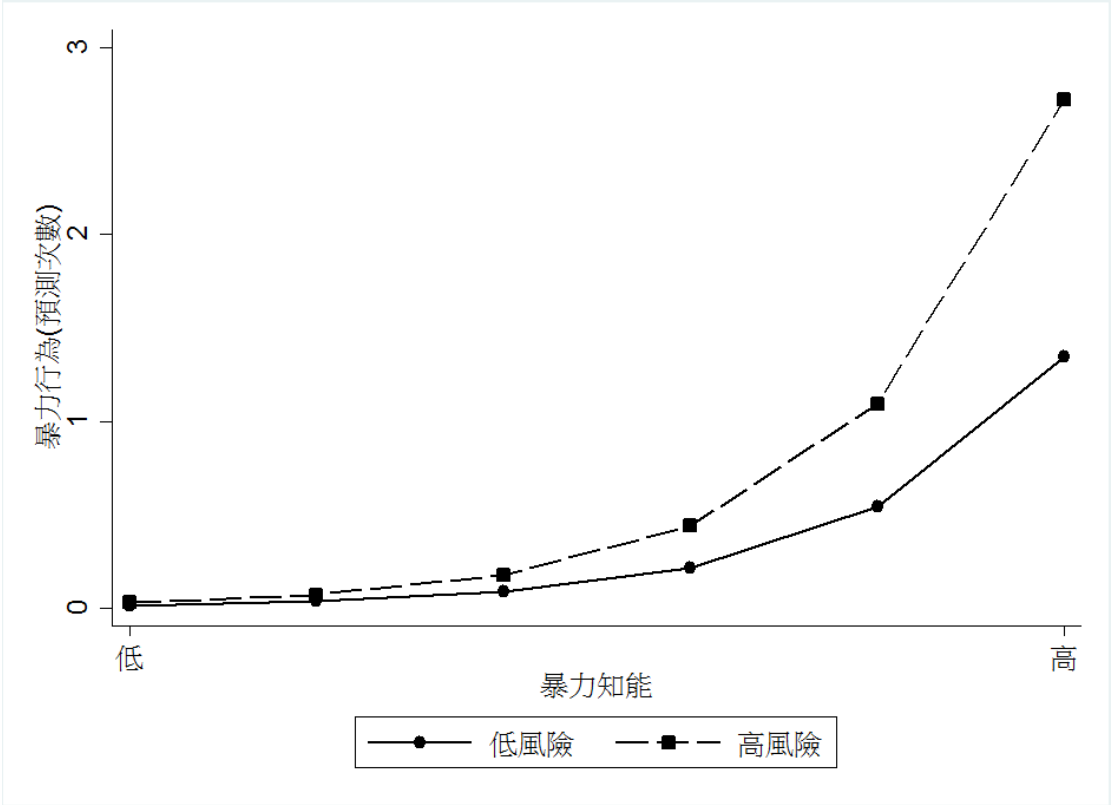
Note: * $p < .05$ ** $p < .01$ *** $p < .001$;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N = 1,565

模型 2 將青少年的暴力知能納入模型之中，用以檢證假設 2。暴力知能正向且顯著地影響暴力行為。暴力知能每增加 1 個單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發生率增加 0.62 倍。這樣的結果呈現，擁有較高暴力知能的青少年施行較高的暴力行為。此外，觀察模型 1 與模型 2 場所相關變項的係數變化，發現場所守則的變化大於兩個場所特質的測量，然而，三者模型 2 中仍維持統計上的顯著，顯示即使在控制了個人的暴力知能下，場所特質與場所守則仍具有獨立的影響力。這樣的結果僅部分支持 SST 有關場所相關變項中介個人暴力知能的論述。總結模型 1 與 2 的分析結果，這個研究確立了主要研究變項對暴力行為的直接效果。

表 4.8 的模型 3 至 5 呈現的是暴力知能與場所相關變項之間的交互作用的分析結果。2 個場所特質的變項僅有活動場所與暴力知能有交互的作用。為了進一步瞭解此一交互作用的狀況，研究者依據模型 3 的結果進行交互作用探索 (probing)。由圖 4.2 可以得知，相較於低風險的活動場所 (低於平均數 1 個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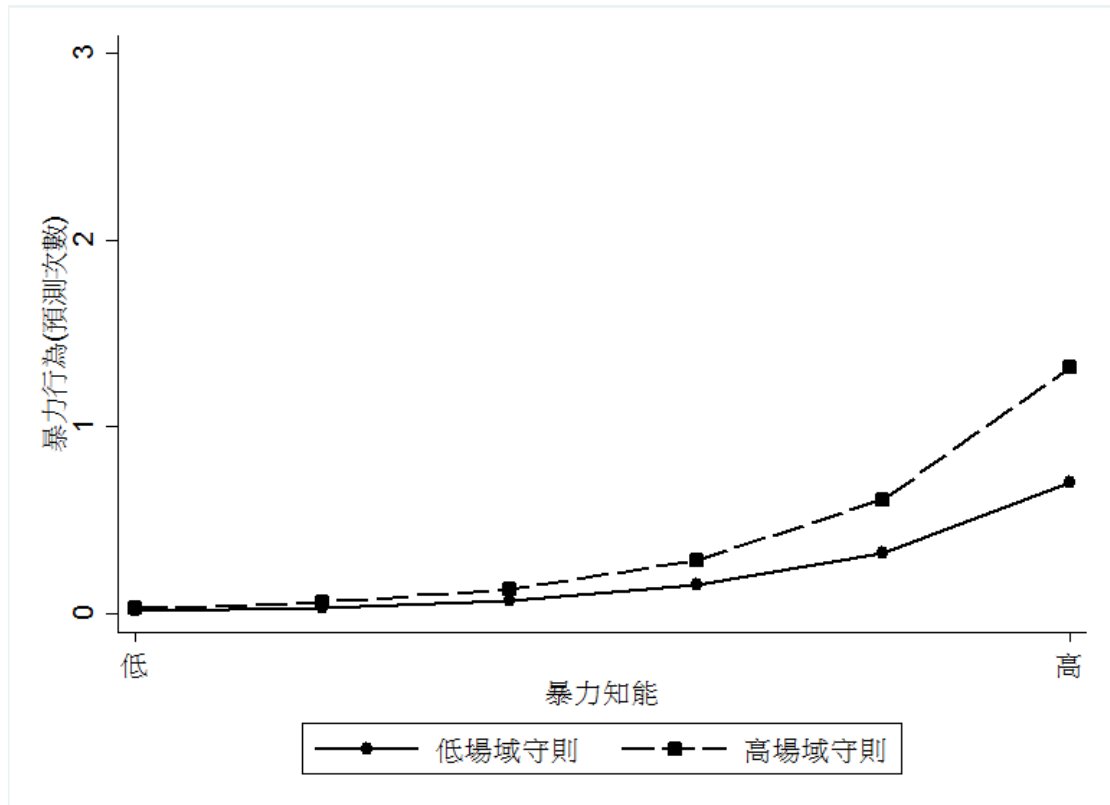
準差)，涉入高風險的活動場所（高於平均數 1 個標準差），暴力知能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力也隨之增加，呈現互為增強的走勢。具有高暴力知能的青少年其活動場所越多是具有風險的特質時，則更容易涉入暴力行為。

圖 4.2 活動場所與場所守則調節暴力知能對暴力行為的影響



其次，模型 5 呈現暴力知能與場所守則之間的交互作用，此一交互作用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依據模型 5 的結果，圖 4.3 呈現交互作用探索的情況。相較於低場所守則（低於平均數 1 個標準差），青少年日常活動的場所具有高的犯罪（或暴力）的規則（高於平均數 1 個標準差），個人的暴力知能對暴力行為的影響也就越大，亦呈現互為增強的走勢。然而，與圖 4.2 相比，這個增強的效果相對的較小。具有高暴力知能的青少年其活動場所中所呈現的行事守則越傾向鼓勵犯罪的話，則其青少年更容易涉入暴力行為。

圖 4.3. 場所守則調節暴力知能對暴力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從晚近犯罪學對於場所的討論出發，結合 Simons 與 Burt 兩位學者所發展的整合性犯罪學理論 SST，用以探討場所特質、場所守則與個人暴力知能三者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台灣青少年的暴力行為同時受到個人的暴力知能、日常活動場所的特質以及場所的守則所影響。對於這些直接效果的發現，支持本研究的研究假設。然而，與研究假設不相符的是，場所相關的變項對於台灣青少年來說，其對暴力行為的影響仍有自外於個人暴力認知的獨立效力。如此的分析與 Simons 與 Burt 兩位學者針對郊區非裔美國人樣本有所不同，值得後續的細究。其次，在調節效果方面，研究顯示場所的風險性與場所傾向暴力的守則會加強暴力知能對青少年的影響力。這樣的發現符合 Simons 與 Burt (2014) 以及 Wikström (2004) 有關情境調控的論述。某些活動場所所釋放出來的訊息會對那些原本就有較高暴力知能的青少年有著鼓勵的作用，使其更容易在該場地施行暴力行為。然而，在分析中既未發現學校暴力行為盛行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也未發現學校暴力行為對暴力知能進行調節，這與過往台灣相關研究不符，亦值得後續研究持續探究其原因為何。

4. 研究目的三：友伴、暴力知能與青少年暴力行為

本研究的第三個研究目的在於結合青少年友伴網絡與犯罪的社會機磨理論，探討友伴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力。研究者已將此一主題撰寫成期刊論文並發表於社會分析期刊。請詳見附錄一。

五、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王浩威，2014，〈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造就了鄭捷這樣一個心理狀態？〉。

《親子天下》網路版：<http://goo.gl/SMKfR8>。擷取日期：2015/10/25。

吳京、李坤崇、尹玫君與胡淑貞，2000，《台灣地區青少年校園暴力防治計畫成果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吳京、李坤崇、尹玫君與胡淑貞，2000，《台灣地區青少年校園暴力防治計畫成果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吳齊殷、高美英，1997，〈嚴酷教養方式之代間傳承〉，頁 215-247，在《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冊》，張芷雲、呂玉瑕、王甫昌編，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吳齊殷、陳易甫，2001，〈家內暴力的成因與後果：以母親為例〉，《應用心理學研究》11，69-91。

李文傑，2012，〈偏差友伴與偏差行為：友伴的影響效果確實存在嗎？〉。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28，119-160。

張明宜與吳齊殷，2013，〈友誼網絡中誰的獲益更多？青少年友誼網絡與學業成就的動態分析〉。《台灣社會學》26，97-146。

張淑貞、李素馨，2008，〈街頭搶奪犯罪時間特性之研究：日常活動理論之觀點〉。《犯罪學期刊》11(2)，65-92。

張楓明，2006，〈社會控制理論之「參與」因素對青少年偏差行為抑制性之實證研究〉。《犯罪學期刊》9（2），69-96。

張楓明，2011，〈學業層面之參與、抱負、自我效能及緊張因素對初次偏差行為為影響之縱貫性研究〉。《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9（3），39-81。

張楓明與譚子文，2011，〈個人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偏差友伴與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關聯性之實證研究〉。《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3（1），133-160。

陳建安，2010，〈社會認知評價與犯罪經驗之關係：一項針對不同犯罪類型之比較研究〉。《中華心理學刊》52（3），287-308。

陳毓文，1999，〈論少年暴力行為與暴力環境之相關性〉。《台大社會工作學刊》1，1-33。

游士嫻，2010，《罪惡不能侵擾之蒂—台灣低犯罪率鄉鎮市區影響因素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董旭英，2003，〈一般化緊張理論的實證性檢驗〉。《犯罪學期刊》6（1），103-128。

詹宜華、張楓明與董旭英，2012，〈國中生接觸偏差友伴在其衝動性格、知覺父母監督與偏差行為間關聯性之中界效果〉，《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18，89-123。

- 劉行五，2009，〈青少年街頭搶奪犯罪之研究—以臺南地區為例〉。《犯罪學期刊》12（1），41-82。
- 蔡德輝、楊士隆，2000，〈青少年暴力犯罪成因：科技整合之實證研究〉。《犯罪學期刊》6，1-34。
- 鄭瑞隆，2000，〈暴力犯罪少年家庭特徵與家庭生活經驗〉。《犯罪學期刊》5，49-78。
- 謝雨生、吳齊殷與李文傑，2006，〈青少年網絡特性、互動結構和友誼動態〉。《台灣社會學》11，175-234。
- 羅時強、林瑞欽與范兆興，2011，〈殺人犯心理特性之研究：社會訊息處理理論之驗證〉。《玄奘社會科學學報》9，55-88。
- 譚子文、董旭英與張博文，2015，〈依附、參與、抱負、信念與青少年學業適應問題關係之研究—社會控制理論的再檢視〉。《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7（1），91-139。
- 譚子文與范書菁，2010，〈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社會緊張因素與台灣地區青少年外向性偏差行為及內向性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32（1），17-42。
- 譚子文與張楓明，2012，〈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友伴及低自我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究〉。《台灣教育大學學報：數理科技類》26（1），27-50。
- 譚子文與張楓明，2013，〈依附關係、低自我控制及接觸偏差友伴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係之研究〉。《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1（4），81-120。

英文書目

- Armstrong, Paul, "Book Review: Randall Collins, *Violence: A Micro-sociological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4), 982-985.
- Akers, Ronald L. and Wesley G. Jennings, 2015, "Social Learning Theory." Pp. 230-240 in *The Handbook of Crimin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Alex R. Piquero, Wiley-Blackwell.
- Baldwin, Mark, 1992, "Relational Schemas and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3), 461-484.
- Bauer, D. J., K. J. Preacher, & K. M. Gil, 2006, "Conceptualizing and testing random indirect effects and moderated mediation in multilevel models: New proced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1, 142-163.
- Bollen, K. A. and R. Stine, 1990,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Classical and bootstrap estimates of variability."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20, 115-140.
- Brantingham, Paul, and Patricia Brantingham, 2008, "Crime pattern theory." In *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and Crime Analysis*, eds. Richard Wortley and Lorraine Green Mazerolle. New York: Routledge.
- Brody, Gene H, Yi-fu Chen, Velma McBride Murry, Xiaojia Ge, Ronald L. Simons, Frederick X. Gibbons, Meg Gerrard, and Carolyn Cutrona, 2006,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Youths: A Five-Year Longitudinal Analysis With Contextual Moderation Effects." *Child Development*, 77, 1170-1189.

- Brody, G. H., Chen, Yi-fu and Kogan, S. M., 2010, "A Cascade Model Connecting Life Stress to Risk Behavior Among Rural African American Emerging Adults."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22(3), 667-678.
- Browne, Michael W., and Robert Cudeck, 1993, "Alternative Ways of Assessing Model Fit." Pp. 136-162 in Kenneth A. Bollen and J. Scott Long (Eds.) *Tes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Newbury Park, CA: Sage.
- Bruinsma, Gerben JN, Lieven JR Pauwels, Frank M Weerman, and Wim Bernasco, 2015, "Situational Action Theory: Cross-Sectional and Cross-Lagged Tests of Its Core Proposit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57(3), 363-398.
- Burk, William J., Haske van der Vorst, Margaret Kerr, and Håkan Stattin, 2012, "Alcohol Use and Friendship Dynamics: Selec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Early-, Middle-, and Late-Adolescent Peer Networks."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and Drug*, 73(1), 89-98.
- Burt, Callie H., Ronald L. Simons, and Leslie G. Simons, 2006, "A Longitudinal Test of the Effects of Parenting and the Stability of Self-Control: Negative Evidence for the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Criminology*, 44, 353-396.
- Burt, Callie H., Gary Sweeten, and Ronald L. Simons, 2014, "Self-Control Through Emerging Adulthood: Instability, Multidimensionality, and Criminological Significance." *Criminology*, 52(3), 450-487.
- Chang, Chih-Yao, 2013, "The Effects of Friendship and Antipathy Networks on Adolescent Attitude Homophily."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Taiwan Sociology Association Conference, Nov. 30-Dec. 1, Taipei, Taiwan.
- Cohen, Allan S. and Seock-Ho Kim, 1998, "An Investigation of Linking Methods Under the Graded Response Model."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2(2), 116-130.
- Cohens, Lawrence E. and Marcus Felson, 1979,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4), 588-608.
- Collins, Randall, 2008, *Violence: A Micro-Sociological Theory*. New Jersey,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jkstra, Jan Kornelis, Siegwart Lindenberg, René Veenstra, Christian Steglich, Jenny Isaacs et al., 2010, "Influence and Selection Processes in Weapon Carrying during Adolescence: The Roles of Status, Aggression, and Vulnerability." *Criminology*, 48(1), 187-220.
- Dodge, Kenneth and C.L. Frame, 1982, "Social Cognitive Biases and Deficits in Aggressive Boys." *Child Development*, 53, 620-635.
- Dodge, Kenneth A. and John D. Coie, 1987, "Social-Information-Processing Factors in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Children's Peer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6), 1146-1158.
- Dodge, Kenneth, J. E. Bates, and G. S. Pettit, 1990, "Mechanisms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 *Science*, 250, 1678-1683.
- Dodge, Kenneth, 2006, "Translational Science in Action: Hostile Attributional Sty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ssive Behavior Problems."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18(3), 791-814.
- Dodge, Kenneth A., Patrick S. Malone, Jennifer E. Lansford, Emma Sorbring, Ann T. Skinner et al., 2015,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 Global Context." *PNAS*, 112(30), 9310-9315.
- Elliot, D. S., D. Huizinga, & S. Ageton, 1985, *Explaining Delinquency and Drug Use*. Beverly Hills, CA: Sage.

- Emirbayer, Mustafa and Ann Mische, 1998, "What is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4), 962-1023.
- Frank, Kenneth A., 1996, "Mapping Interactions within and between Cohesive Subgroups." *Social Networks*, 18, 93-119.
- Gibbons, FX, M. Gerrard, LS Vande Lune, TA Wills, G Brody, and RD Conger, 2004, "Context and Cognitions: Environmental Risk, Social Influence, and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8), 1048-1061.
- Gibbons, Frederick X., Megan E. Roberts, Meg Gerrard, Zhigang Li, Steven R. H. Beach, Ronald L. Simons, Chih-Yuan Weng, and Robert A. Philibert, 2012, "The impact of stress on the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of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Cognitions, genetic moderation, and the role of discrimin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8(3), 722-739
- Gottfredson, Michael and Travis Hirschi,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i, Travis,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Haynie, Dana L, 2001, "Delinquent Peers Revisited: Does Network Structure Mat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1013-1057.
- Haynie, Dana L., Nathan Doogan, & Brian Soller, 2014, "Gender, Friendship Networks and Delinquency: A Dynamic Network Approach." *Criminology*, 526, 688-722.
- Hu, Li-tze and Peter M. Bentler,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6(1), 1-55.
- Jaccard, J., H. Blanton, and T. Dodge, 2005, "Peer Influences on Risk Behavior: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a Close Frie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1, 135-147.
- Jackson, Corrie L., Rochelle F. Hanson, Ananda B. Amstadter, Benjamin E. Saunders, and Dean G. Kilpatrick, 2013,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 Between Peer Violent Victimization and Delinquency: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U.S. Adolescent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8(8): 1596-1616.
- Jacksona, Nicki, Simon Dennyb, Shanthi Ameratungaa, 2014, "Social and Socio-demographic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Adolescent Alcohol Us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ulti-level Studi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15, 10-20.
- Jones, Adrian M., 2015, "When in Rome: Testing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Neighborhood Composi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trol and Juvenile Offending." *Crime & Delinquency*, doi: 10.1177/0011128715596989.
- Lee, Zong-Rong, Chyi-In Wu, Yu-Ting Huang, 2013, "Exploring the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Structural Holes in Teenagers' Friendship Networks." Pp. 109-130 in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ast Asian Youth* edited by Chin-Chun Yi, Dordrecht: Springer Publishing Co.
- Katz, Jack, 1988, *Seductions of Crime: Moral and Sensual Attractions in Doing Evil*. LA, CA: Basic Books.
- Kolen, Michael J. and Robert L. Brennan, 2004, *Test Equating, Scaling, and Linking: Method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NY: Springer.
- Kreager, D. A., K. Rulison, and J. Moody, 2011, "Delinquency and the Structure of Adolescent Peer Groups." *Criminology*, 49, 95-127.
- MacKillop, James, Michael T. Amlung, Lauren R. Few, Lara A. Ray, Lawrence H. Sweet, and Marcus R. Munafò, 2011, "Delayed Reward Discounting and

- Addictive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Psychopharmacology*, 216(3), 305-321.
- MacKinnon, David P., Amanda J. Fairchild, and Matthew S. Fritz, 2007, “Mediation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8, 593-614.
- Matsueda, Ross L., 1988, “The Current State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Crime & Delinquency*, 34(3), 277-306.
- Mercken, Liesbeth, Tom A.B. Snijders, Christian Steglich, Hein de Vries, 2009, “Dynamics of Adolescent Friendship Networks and Smoking Behavior: Social Network Analyses in Six European Countri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9(10), 1506-1514.
- Messner, Steven F. and Richard Rosenfeld, 2012, *Crim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5th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 Moule, Richard K. Jr., Callie H. Burt, Eric A. Stewart, and Ronald L. Simons, 2015,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Individuals’ Code of the Street Beliefs through Emerging Adulthood.”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52(3), 342-372.
- Muthén, L.K. and B.O. Muthén, 1998-2012. *Mplus User’s Guide. Seventh Edition*. Los Angeles, CA: Muthén & Muthén.
- Sampson, Robert J., Stephen W. Raudenbush, and Felton Earls, 1997,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277, 918-924.
- Shrout, P. E. and N. Bolger, 2002, “Mediation in Experimental and Nonexperimental Studies: New Proced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Psychological Methods*, 7, 422-445.
- Shanahan, M. J. and Ross Macmillan, 2008, *B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Contexts and Contingencies*. New York: Norton.
- Simons, Ronald L., Yi-Fu Chen, Eric A. Stewart, and Gene H. Brody, 2003, “Incidents of Discrimination and Risk for Delinquency: A Longitudinal Test of Strain Theory with an African American Sample.” *Justice Quarterly*, 20, 827-854.
- Simons, Ronald L., Leslie G. Gordon, Yi-fu Chen, Gene H. Brody, and Kuei-Hsiu Lin, 2007, “Identifying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45(3), 481-517.
- Simons, Leslie Gordon, Ronald Simons, and Xiaoli Su, 2013, “Consequences of Corporal Punishment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ual Outcom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2(8), 1273-1285.
- Simons, Ronald and Callie Harbin Burt, 2011, “Learning to be Bad: Adverse Social Conditions, Social Schemas, and Crime.” *Criminology*, 49(2), 553-598.
- Simons, Ronald L., Chyi-in Wu, Kuei-Hsiu Lin Leslie Gordon, Rand D. Conger, 2000,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 of the Link between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Adolescent Antisocial Behavior”, *Criminology*, 38(1), 47-80.
- Simons, Ronald L., Man Kit Lei, Steven R. H. Beach, Gene H. Brody, Robert A. Philibert, and Frederick X. Gibbons, 2011, “Social Environment, Genes, and Aggression: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6), 883-912.
- Simons, Ronald L., Man Kit Lei, Steven RH Beach, Gene H Brody, Robert A Philibert, Frederick X Gibbons, and Meg Gerrard, 2013, “Differential Sensitivity to Context: GABRG1 Enhances the Acquisition of Prototypes That Serve as Intermediate Phenotypes for Substance Use.” Pp. 303-326 in *Genetic Influences on Addiction: An Intermediate Phenotype Approach* edited by James MacKillop and Marcus R. Munafò.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Simons, Ronald L. and Ashley B. Barr, 2014, "Shifting Perspectives: Cognitive Changes Mediate the Impact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s on Desistance from Crime." *Justice Quarterly*, 31(5), 793–821.
- Simons, Ronald L., Callie H. Burt, Ashley Barr, Man Kit Lei, & Eric A. Stewart, 2014, "Incorporating Routine Activities, Activity Spaces, and Situational Definitions into the Social Schematic Theory of Crime." *Criminology*, 52(4), 655-687.
- Snijders, T. A. B., 1996, "Stochastic Actor-oriented Dynamic Network Analysi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21, 149–172.
- Snijders, T. A., 2005, "Models for Longitudinal Network Data." *Models and Method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1, 215-247.
- Snijders, T. A., Van de Bunt, G. G., & Steglich, C. E., 2010, "Introduction to Stochastic Actor-based Models for Network Dynamics." *Social Networks*, 32(1), 44-60.
- Spencer, Margaret Beale, Davido Dupree, Michael Cunningham, Vinay Harpalani, Michele Munoz-Miller, 2003, "Vulnerability to Violence: A Contextually-Sensitiv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9(1), 33-49.
- Steiger, J. H., 1990, "Structural Model Evaluation and Modification: An Interval Estimation Approach." *Multivariate Behavioural Research*, 25, 173-180.
- Sewell, William H., Jr., 1992,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29.
- Thissen, David, Lynne Steinberg, and Howard Wainer, 1993, "Detection of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Using the Parameters of Item Response Models." Pp. 67-113 in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edited by Paul W. Holland and Howard Wainer, Hillsdal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Warr, Mark and Mark Stafford, 1991, "The Influence of Delinquent Peers: What They Think or What They Do?" *Criminology*, 29, 851-865.
- Wikström, Per-Olof H. and Robert J. Sampson, 2003, "Social Mechanisms of Community Influences on Crime and Pathways in Criminality." Pp. 118-148 in *Causes of Conduct Disorder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edited by Benjamin B. Lahey, Terrie E. Moffitt, and Avshalom Caspi,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 Wikström, Per-Olof H. and Kyle Treiber, 2007, "The Role of Self-Control in Crime Causation: Beyond Gottfredson and Hirschi's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2), 237-264.
- Wikström, Per-Olof H. and Kyle Treiber, 2009, "Violence as Situational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3(1), 75-96.
- Wikström, Per-Olof H., Dietrich Oberwittler, Kyle Treiber, and Beth Hardie, 2012, *Breaking Rules: The Social and Situational Dynamics of Young People's Urban Crim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kström, Per-Olof H., 2014, "Why Crime Happens: A Situational Action Theory." Pp. 74-94 in *Analytical Sociology: Actions and Networks* edited by Gianluca Manzo. UK: Wiley & Sons, Ltd.
- Wills, TA, JD Sargent, FX Gibbons, M. Gerrard, and M. Stoolmiller, 2009, "Movie Exposure to Alcohol Cues and Adolescent Alcohol Problem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in a National Sample."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 23(1), 23-35.
- Wang S-H, I-C Lin, C-Y Chen, D-R Chen, T-C Chan, W-J Chen, 2013, "Availability of Convenience Stores and Adolescent Alcohol Use in Taiwan: A Multilevel

- Analysis of National Surveys.” *Addiction*, 108(12), 2081-2088.
- Wei, H. S. and W ee, 2014, “Individual and Social Network Predictors of Physical Bully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aiwanese Early Adolescents.” *Violence and Victims*, 29(4), 701-716.
- Wu, Chyi-In and Man-Kit Lei, 2013, “Deviant Peers and Delinquency: The Influence of Classroom Context.” Pp. 91-107 in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ast Asian Youth* edited by Chin-Chun Yi, Dordrecht: Springer Publishing Co.
- Wu, Chyi-In, 2015, “The Impact of Co-evolution of Dynamic Networks upon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ining and Analyzing Social Networks for Decision Support, Paris, France: The 2015 IEEE/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and Mining, Aug 25-28.

附錄一

青少年暴力行為之研究：暴力認知以及友伴特質的影響¹

陳易甫

台北大學社會系

摘要

近年來台灣暴力事件屢屢震驚社會，針對青少年時期暴力行為形成的研究實為迫切。這個研究從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的上游（up-stream）防制的觀點，探討影響青少年暴力行為的早期社會因素。這個研究從認知偏誤的研究（Crick & Dodge, 1994；Dodge, 2006；Wills et al, 2000）以及晚近犯罪學/偏差社會學的理论發展中對於個人所處環境與其所持的社會基模（Simons & Burt, 2011）與攻擊性行為關連的研究出發，探討青少年所處的環境對於其暴力認知的涵養，進而使其較易選擇用暴力的方式來處理人際的關係，而有較高的暴力行為。此外，這個研究更進一步從友伴網絡的觀點出發，探討友伴的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對青少年本身的暴力行為的影響。依據一筆台灣本土的青少年友伴網絡資料的分析結果，這個研究顯示青少年的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受到父母的負面教養、青少年所居住鄰里的凝聚力以及個人本身的受害經驗的影響，而暴力認知也顯著的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此外，相較於友伴的暴力認知，友伴的暴力行為更能夠解釋青少年暴力行為的高低，顯示出社會學習理論中的仿效效果。本文依據這些發現進行理論上的詮釋。

關鍵字：暴力認知、暴力行為、友伴網絡、網絡自我相關模型、仿效效果

¹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珍貴建議與指正。也感謝李宗棠先生協助處理初期的資料整理工作。更感謝中研院社會所吳齊殷研究員慷慨地同意作者使用其研究資料。

青少年暴力行為之研究：暴力認知以及友伴特質的影響

近年來台灣社會發生多起驚動社會的暴力犯罪事件，從 2012 年的湯姆熊割喉案、2013 年八里雙屍案、2014 年北捷隨機殺人事件以及近期的內湖女童案，皆引發台灣社會各界的討論。受害者家屬的傷痛、加害者家人的歉疚以至於隨之興起的廢死與反廢死的爭論，使這個社會陷入精力與情緒上的消耗。然而，真正的問題，即「暴力行為從何而來？為何發生？」，卻鮮少在這一系列的討論中被認真對待。雖說，司法的程序正義以及人權的改革是當下台灣急迫的議題，然而，即使改革成功，也僅於處理暴力犯罪生成的「下游」所衍生的問題。暴力犯罪的「上游（up-stream）」，亦即影響其生成的因素，應該是更需要各界探討的議題。這個「上游」的探討與過去經驗研究指出的犯罪與暴力行為有其生命歷程的連續性相關，即成人時期的犯罪與暴力行為與青少年時期的暴力與攻擊性行為具有相當程度的關連（Robins, 1978；Farrington, 1989）。因此，欲探討這些驚動社會的暴力犯罪事件的源由，從探討青少年暴力與攻擊性行為的成因著手，應是一條必要的研究取向。

在前述新聞事件發生時，一些評論家試著跳脫輿論一面倒地對施暴者個人因素的追究，以社會整體造就一個犯罪者角度，去闡述「台灣的社會造就了鄭捷」的觀點（王浩威，2014）。王浩威認為台灣的家庭與學校現場不斷的在重製鄭捷的「生命狀態」，暴力犯行並非單獨的個體現象，而可能是整體社會的現象。這樣的觀點，頗符合主流偏差社會學將暴力行為解釋成社會的產物並直指背後社會結構的問題。然而，這些結構是如何造成個人的暴力行為的產生？所謂的「生命狀態」其內涵為何，仍須細究。這個研究將從較為微觀的角度出發，強調青少年所處環境與情境對其認知的影響，進而將青少年推入暴力施行的途徑。

過去認知心理學與社會學心理學的相關研究認為個人對風險行為（risky behaviors）賦予正面的認知會增加個人從事這些風險行為的可能性。例如，個人對於使用菸酒藥物的意向（intention）與志願（willingness）持正向且意願嘗試的態度以及在個人認知上對於這些物質（substance）的認可，使個人更容易

去使用，甚至過度使用這些物質（Brody et al., 2012；Cleveland et al., 2005；Wills et al., 2000）。相類似地，Dodge 與其同僚在他們一系列的作品中借用認知訊息處理（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概念提出個人敵意歸因模式（hostile attribution style），可作為解釋個人攻擊行為（aggressive behavior）的發生原因（Dodge, 2006；Dodge & Frame, 1982；Crick & Dodge, 1994）。Dodge 從這個理論出發，陳述攻擊性行為的成因在於個人在認知訊息的處理過程中因為所處環境的影響而形成的「偏誤（biased）」歸因。當個人過去的經驗皆讓其建立起一套以敵意反應為主的訊息處理模式時，那麼這套的模式將成為個人行動的引導常規，影響著個人對於環境訊息的判斷以及決策歷程，使得個人更容易陷入攻擊行為的循環當中。

近五年來，Simons 與 Burt 兩位學者試圖從社會學習理論的傳統出發，結合發展心理學與前述認知心理學的社會訊息理論的傳統，發展出一套解釋社會過程與個人因素如何影響個人的偏差、暴力或犯罪行為的理論框架：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SST；Simons & Burt, 2011）。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強調個人所處的劣勢環境將人「推入」暴力行為的發展路徑。其中，個人處在劣勢環境中會較傾向以暴力的、衝動的以及有仇必報的待人接物準則來行事。在社會互動中，較容易將他人的舉動詮釋成對自己具有敵意，也因此較容易以暴力行為來做應對。Simons 與其同僚以非裔美國人的樣本測試這個理論的經驗基礎。在一系列的研究中，他們確立了青少年所處的家庭與社區環境以及其受暴經歷會影響其犯罪基模的形成，而這樣的犯罪基模進而影響青少年暴力行為的施行（Simons & Burt, 2011；Simons et al., 2011；Simons et al., 2013）。

前述的理論觀點不約而同的將認知以及與認知相關的概念連結至研究青少年的風險行為與暴力行為。這些認知相關的概念連接著青少年所處的家庭與社區環境與青少年暴力行為之間的關連。這個研究第一個研究目的在於以 SST 這個晚近發展出來的整合性理論為基礎，以台灣本土的資料來探討認知相關的因素對青少年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的影響。

其次，青少年的暴力行為並非憑空而來的，其行為鑲嵌在多種的社會脈絡下。除了前述家庭與社區的脈絡外，友伴關係在過往的文獻中最常被提及，也被認為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Jaccard, Blanton, & Dodge, 2005；Kreager, Rulison, & Moody, 2011；李文傑，2012）。以友伴在解釋青少年暴力行為的重要性，實需將之納入本研究所採用的理論架構中。然而，在 Simons 等人的一系列研究中，卻鮮少將友伴的影響納入他們的經驗研究當中。此外，自 Warr 與 Stafford（1991）將友伴的犯罪態度與犯罪行為納入同一個模型做探討以來，較少有過往的研究持續的檢測友伴的態度或本研究所重視的認知因素對青少年犯罪行為的影響。這個研究引入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觀念來探討友伴的認知與行為的影響力。這構成這個研究的第二個研究目的：在 SST 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納入以社會網絡為基礎的友伴影響因素，探討青少年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的友伴影響因素，以此擴充該理論在友伴影響的相關論述。

二、文獻探討

1. 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SST）與暴力認知

Simons 與 Burt（2011）承接了 Akers 的社會學習理論的觀點提出了 SST。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個人的犯罪行為是學習或仿效而來。個人透過與環境的互動，進而學習傾向支持犯罪的信仰、態度、定義與價值，再進一步反映在其行為上，產生犯罪行為（Akers & Jennings, 2015）。相較於社會學習理論著重學習的對象以及學習條件，SST 著重這些學習的內容（content）為何。SST 借用社會心理學與發展心理學的認知基模（cognitive schema）概念，指出這個學習的內容包括三種不同但相關連的成分（components）或該理論稱作的「社會基模（social schema）」：**對社會關係採敵意觀**（hostile view of relationships）、**衝動或即時享樂**（impulsivity or immediate gratification）的想法以及**對社會規範的冷嘲熱諷觀**（cynical view of conventional norms）。雖然，兩位學者認為三個社會基模共同指向一個更高的構念—犯罪知能結構（criminogenic knowledge structure），在與暴力行為對應時，**對社會關係採敵意觀**發揮的影響力仍是最大。因此，這個研究將以這個基模為主來探討其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並與其他的研究傳統作連結。

社會基模的概念源自於 Baldwin (1992) 的關係基模的討論。他回顧當時既有的社會認知理論而提出有關個人處理社會訊息的關係基模 (relational schema) 的概念。關係基模涵蓋了個人在持續地且累積地接收情境/環境訊息後所產生的有組織性、有引導性且具有規範性的知識體系。這個體系包含著個人在過去經驗累積下，所習得的人際間的腳本 (interpersonal scripts)。在與他人互動時，個人可以借用這些腳本來定位自我並定位與他人互動應該有的應對進退。在關係基模的架構下，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習得社會訊息的處理模式並構成個人的知識。

借用這樣的觀念，SST 強調：個人的犯罪行為實為個人接收、仿效與學習周遭傾向犯罪的腳本後，所進行的行動。個人依據過去的經驗所習得的腳本與基模成為其行事的標準，SST 依據這樣的理論原則，認為：**惡劣的環境因素** (adverse environments)，使個人「學壞 (learn to be bad)」。於是個人習慣使用敵意觀的基模來對待他人，也因此傾向於從事犯罪的行為。總結來說，SST 認為偏好犯罪的社會基模構成一個人行動的心智結構 (mental structure)，而此心智結構受到個人所處社會條件所影響而生成，並對個人的犯罪行為產生重大的影響 (Simons & Burt 2011, p. 556)。對**社會關係採敵意觀**即在描述個人在與人互動時採用懷疑、認定別人居心不良以及自覺受委屈並心生不滿的態度。此外，SST 也擷取 Anderson (1999) 的「街上守則 (street code)」的概念，將逞強鬥勇的待人模式納入這個社會基模中。Anderson 針對都市地區非裔男性的幫派以及暴力行為為主題進行民族誌研究。其研究發現，由於該地區暴力與犯罪行為盛行，非裔男性生活在該地區，共享著一套規範或次文化守則。公開與人互動時，需要顯示自己的強悍 (toughness)、有仇必報以及以眼還眼的行事風格。亦即，當個人與他人互動時，有受侵犯、受污辱或丟臉的感覺時，個人理所當然的採用暴力的行為作為反擊。SST 認為當行動者在這個社會基模中的傾向較高時，較會將人際間的互動朝惡意的方向去**定義**，進而增加暴力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類似的論述可以在 Dodge 的訊息處理理論中發現。Dodge 陳述攻擊性行為

的成因在於個人在認知訊息的處理過程中因為所處環境的影響而形成的「偏誤 (biased)」歸因。當個人過去的經驗皆讓其建立起一套以敵意反應為主的訊息處理模式時，那麼這套的模式將成為個人行動的引導常規，影響著個人對於環境訊息的判斷以及決策歷程，使得個人更容易陷入攻擊行為的循環當中。Dodge 與其共同作者在一系列的研究中皆對這樣的過程提供實證資料上的支持 (Dodge & Coie, 1987; Dodge, Bates, & Pettit, 1990) 並以此提出攻擊性行為的可能介入方案 (Dodge, 2006; Dodge et al., 2015)。台灣本土的經驗研究則有陳建安 (2010) 針對 290 位成年犯所進行研究，其研究成果連結了犯刑人的社會認知評價與其犯罪經驗的特定性。此外，張楓明與譚子文 (2011) 從社會控制理論的角度探討青少年對社會道德規範的信念與偏差行為之間的關連。分析 8 所國中共 888 位學生的資料後，他們的研究顯示，即使控制個人的負面生活事件以及偏差友伴，青少年的道德信念仍顯著地影響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羅時強、林瑞欽與范兆興 (2011) 更以殺人犯的樣本直接檢證 Dodge 的社會訊息處理理論並證明這些犯人在認知上的「扭曲」、「攻擊性」以及「衝動性」的特徵。這樣的論點也與過往研究認知上的易受害性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與菸酒藥等物質使用的關連相符合 (Brody et al., 2012; Cleveland et al., 2005; Wills et al., 2000)。這些學者認為個人對於酒藥等物質持認可的印象 (image)、正向的使用意願與意圖 (intention and willingness)，使個人更容易去使用這些物質。因此，戒斷這些物質的介入方法之一為改變個人對於這些物質的認知 (Brody et al., 2012)。

從這些研究可知，社會基模、訊息處理過程以及認知易受害性直指著行動者的認知對行動施行產生的影響。青少年所處的環境影響著他們對於暴力、犯罪以及物質使用的記憶 (memory)、行事所遵循的規則 (scripts)、看法與意圖 (image、intention & willingness) 以及如何評估與行動的訊息處理過程 (information processing)。將這個概念運用在探討青少年暴力行為中，這個研究將這些過程統稱為**暴力認知 (violent cognition)**，並假設：當青少年具有較高的暴力認知將會增加其施行暴力行為的可能性。

2. 影響暴力認知的因素

Simons 與 Burt 兩位學者在其理論中進一步探討造成這樣認知的來源為何。在 SST 理論的闡述中，這與個人所處家庭、社區以及過往受害經驗息息相關。家庭作為個人最早的成長環境在偏差與犯罪的理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社會學習理論指出個人處在暴力盛行的家庭環境中，如負面教養、高家人間衝突以及父母敵意與忽視皆使得家庭成為暴力盛行的環境。個人處在暴力盛行的環境中，會培養出具有敵意、不信任以及傾向用暴力手段解決事情的行事準則。本土與國外的研究皆指出，遭受負面教養與受過家內暴力的經驗，會讓個人內化並習得這樣的手段是處理人際衝突的有效作法，進而對其他人也採取類似的方法互動（吳齊殷與高美英，1997；吳齊殷與陳易甫，2001；Dodge, Bates, & Pettit, 1990；Simons, Simons, Su, 2013）。由此可知，青少年所受的教養實為涵養其暴力認知的重要影響因素。這個研究假設：父母的負面教養影響著青少年的暴力認知，進而影響其暴力行為。其中，負面教養則會增強其暴力認知，進而增加其暴力行為的施行。

除了家庭社會化的因素外，個人生活脈絡的經歷與體驗也影響著個人暴力認知的形成。一些美國的研究從一般緊張理論出發，強調種族歧視（racial discrimination）的經驗構成一種緊張壓力，讓人心生不公之感增加，進而讓個人比較容易選擇以暴制暴的手段反擊，進而產生犯罪（Agnew, 2005；Simons et al., 2003；Brody et al., 2006）。這樣的邏輯也適用在個人目睹他人受暴或本身就是暴力受害者的經驗上。當個人經常地目睹或經歷人對人之間的暴力對待時，會使得個人學習並傾向認可使用暴力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進而產生犯罪的行為（Jackson et al., 2013）。由於種族歧視在台灣仍屬特殊脈絡下發生的行為，很難廣泛的觀察到。因此，這個研究僅探討青少年受暴經驗的影響。這個研究假設：當青少年本身遭受暴力的傷害時，將更容易涵養出較高的暴力認知，進而影響其暴力行為的施行。

依循著 Anderson（1999）的研究基礎，過往的理論也將社區的特質納入影響暴力認知的因素之一。社區解組理論以及與其相關的社會控制理論分別提及頹敗與犯罪充斥的鄰里（neighborhood）以及欠缺非正式控制的鄰里或鄰里的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皆使鄰里發展出獨特的犯罪次文化並成為暴力認知

滋長的溫床（Anderson, 1999；Sampson, Raudenbush, & Earls, 1997；Simons et al., 2007）。由於台灣鄰里的概念與美國那種社區的概念有所區別，在這個研究中，研究者利用青少年自陳的住家附近的情況來作為概念上的相比。這個研究假設：青少年居住在較高社區凝聚力的地方，則較不容易發展出暴力認知，也進而減少其暴力行為的出現。

3. 友伴的影響以及台灣以班級為基礎的生活空間

社會學習理論或差別結合理論十分重視偏差友伴對個人偏差與犯罪行為的影響。然而，有趣的是從社會學習理論出發的 SST 卻鮮少對友伴這個影響因素做理論上或經驗研究上的討論。在其一系列檢驗 SST 的文章中，Simons 等人僅在 2011 年的研究中將友伴的偏差行為視為連結青少年所處的劣勢環境與三個社會基模之間關係的一個因素。在其之後的研究中，皆未再針對友伴的影響進行任何論述，這與其所遵循的社會學習理論傳統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此特別將友伴的因素放入這個研究當中，針對 SST 進行補充。

過去的文獻已經證明友伴對個人的偏差與犯罪行為的影響力不小於家庭（Jaccard, Blanton, & Dodge, 2005；Kreager, Rulison, & Moody, 2011；Haynie, 2001）。特別是在青少年時期，友伴可說是青少年學習與仿效（imitate）的主要來源。然而，過去的研究大多重視友伴的偏差行為對青少年行為上的影響力，甚少觸及友伴對個人信念或認知的影響力為何。其實，這樣的提問在 1990 初期就由 Warr 與 Stafford 所提出。Warr 與 Stafford（1991）從社會學習的觀點提出個人對犯罪的態度與犯罪行為受到友伴的犯罪態度與犯罪行為的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個人的態度與行為受到友伴偏差行為的影響，呈現社會學習理論的仿效的機制。此外，個人周遭友伴的行為也可以視為其所處社會脈絡的「偏差的社會規範（social norms of delinquency）」，涵養著個人的暴力認知，並使個人較傾向用犯罪或暴力的方式行事。因此，本研究擷取社會學習理論傳統的學者 Warr 與 Stafford（1991）的研究，將友伴的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納入分析架構中。

然而，這樣的設定仍有其不足之處，忽略了友伴影響文獻中有關友伴網絡

的觀點。特別是，要將這個理論應用至台灣青少年研究時，研究者需要注重班級網絡的特殊性。這是因為，台灣或東亞學校制度的安排，讓同學齡的青少年長期的處在同一個班級內部活動，因此，班級內部友誼網絡的特徵以及其浮現的「常規」可能形成一個獨特的影響因素。過去台灣本土的研究已經發現班級內的友誼網絡影響青少年的學業成就（張明宜與吳齊殷，2013）、心理特質（Lee, Wu, & Huang, 2013）與偏差行為（Wei & Lee, 2014；Wu, 2015），而個人的特質也影響著班級網絡的長期變化與形成（謝雨生、吳齊殷與李文傑，2006）。由於這個研究使用的是橫斷面的資料，無法處理友伴網絡的動態變化。更由於這個研究的提問比較傾向於友伴對於青少年的影響，因此，在分析上採用社會網絡分析中的影響模型（influence model）或網絡自我相關模型（network autocorrelation model）（Leenders, 2002）。透過對加權矩陣（the Weight matrix）的設定，這個研究將個人的友伴網路的特質與其友伴的特性同時納入模型當中進行探討。這個研究假設：當青少年與具有較高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的友伴交友時，將會有較高的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

三、研究方法

1. 資料來源

為了驗證這個研究所提出的假設，研究者將採用吳齊殷研究員目前正在進行「落霞與孤鶩、秋水共長天：青少年友敵關係同質性的考察與檢驗」研究計畫（後簡稱落霞計畫）的第一波資料。該計畫於2014年8月開始進行為期三年調查，調查對象為2014年8月入學之國中、高中與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預計在2016年8月進行最後一次的調查。這個研究使用落霞計畫的第一波資料，並將資料範圍限制在國高中的樣本。

落霞計畫在第一年的調查中將台灣區分為北中南東四個區域，以分層叢集抽樣的方式在各區域抽取樣本國高中，然後再從抽中的學校中隨機選取一至二個班級進行調查，當班級被抽中時，班上所有的學生皆納入研究樣本中。最後抽取48個班級進行調查。因為有些學校是完全中學，同時具有國高中部，最後調查學校共有19所。在第一年調查結束時，共有604位國一生與626位高一

生，共 1,230 位學生接受調查。受調查學生皆在家長閱讀並簽署同意書的情況下，才納入本研究的調查樣本中。所有的調查皆遵循中研院倫理中心審查後的調查程序進行。在排除研究變項的缺失值以及因為所提名的好友並不在研究樣本中而造成友伴測量的缺失後（ $n = 104$ ），最後可分析樣本為 1,126 位學生，其中男女比例約各佔半數（51.2%與 48.8%）。

比較 104 位因變項缺失值而被排除的學生與最後分析樣本的學生後發現，被排除的學生有較多是從家庭收入較低家庭中成長的。除此之外，這些被排除的樣本在所有研究變項上皆與最後的分析樣本中的學生沒有顯著的差距。在後續的分析中，將家庭收入納入分析的模型中進行控制。

2. 變項描述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暴力行為**。受訪者自答他們過去六個月作過下列行為的次數：恐嚇他人、與人打架、丟擲物品傷人、隨身帶武器、打傷人以及暴力勒索他人等。此外，為了能夠涵蓋更大的行為表現，這個研究也將闖入別人家中、故意損壞東西這兩項具有暴力傾向的行為納入暴力行為的測量中。由於各項行為的次數分佈呈現嚴重正偏，在這個研究中，將各項分數重新編碼：沒有做過者編為 0、做過 1 次以上者編為 1。最後將各項分數總加成為暴力行為的測量。由於這個變項類似計算各項暴力行為的次數，而其次數分佈明顯右偏。研究者將此依變項重新編碼成三個類別：沒有作過任何暴力行為（0）、作過一次（1）以及作過 2 次以上（2）。由此這個變項為一次序變項，在後續的分析中將以處理次序變項之線性模型分析之。

依據前述理論的探討，本研究的主要自變項有父母負面教養、社區凝聚力、受害經驗、暴力認知以及友伴的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父母**負面教養**是由 4 個題目所組成，分別詢問父母用打罵的教養行為，其編碼 4 點量表（1=從未、4=時常）。在過去的研究中此一測量顯著的預測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與暴力行為，具有良好的效標關連效度（周玉慧與吳齊殷，2001；李文傑與吳齊殷，2004）。研究者將父與母的題目各自總加求得父與母的負面教養總分，然後，再將父母的分數平均，求得負面教養的測量，分數越高表示家庭實行較多的負面

教養。父與母題目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為.84 與.83。**社區凝聚力**則是測量青少年居住地區的凝聚力。研究者參考社會變遷四期二次有關社區特質的描述，外加參考台灣青少年研究（Taiwan Youth Study；TYP）有關社區的測量編修而成。此一量表由 9 個題目所組成，研究者詢問受訪青少年是否同意社區居民有共同的看法、想法以及對社區事務是否關心。其答項為 5 點量表（1=很不同意、5=很同意），將 9 題的分數相加即為社區凝聚力的測量，其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6。過往的研究顯示這個測量與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有顯著的關連（石友馨，2008）並與社區居民對於犯罪恐懼有正向的關連（翁國峰，2007），具有良好的效標關連效度。**受害經驗**由 10 個題目所組成的，詢問青少年在過去一年中是否有被人打傷、圍毆、被勒索以及東西被破壞等情況的發生頻率。其答項為 4 點量表（1=從來沒有、4=幾乎每天）。研究者將 10 題的總分相加即為受害經驗的測量。其內部一致性係數為.63。

暴力認知由 8 個題目所組成，詢問青少年是否贊同使用暴力、以牙還牙或攻擊性的方式來處理人際關係。此一題組擷取自 Simons 等人為檢證 SST 而設計的題組。原始的題目為英文，並在過往的研究中證明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Simons et al., 2011, 2013），研究者在獲得 Dr. Simons 的同意後，委託專業翻譯人士進行英翻中以及中翻英（back translation）。在落霞計畫進行正式資料蒐集之前，研究者以一班國中生以及一班大學一學生（N = 50）進行預試。初步發現此一題組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alpha=.81$ ）並與青少年自我回答的暴力行為有中等程度的相關（Pearson's r 為.29），初步具有良好的效標關連效度。此一題組的答項為 5 點量表（1=很不同意、5=很同意），將 8 題的分數相加，分數越高表示個人越認同採用暴力的方式來處理人際關係，本研究的分析樣本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87。

友伴的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由青少年所填寫的好友名單而來。研究者要求青少年填寫他們最好朋友的姓名。在問卷的設定上，填寫的名字數並無限制，然而，從資料中觀察，超過 98%的提名是在 6 人以內。在這個研究友伴的效果是依據 Leenders（2002）的操作方式計算加權矩陣（the Weight matrix），建構友伴自陳的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的變項，用以測量友伴網絡的影響效果

(influence effect of peers)。這個研究採取的是以友伴的 in-degree 為權數乘上友伴自答之暴力行為與暴力認知的分數，並將受訪者所提名的所有友伴之加權分數總加後，來獲得代表友伴影響力的兩個變項：友伴暴力認知與友伴暴力行為。這樣的變項建構方式具有兩層的意義。首先，in-degree 可代表友伴在班上的相對受歡迎的程度，以此來建構友伴影響力變項所代表的是友伴個人認知與行為與其個人在班級友伴網絡中位置的加乘影響效果。所具有的理论提問為：與較受班上歡迎且具有較高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的友伴作朋友，是否會讓青少年更容易學習到其認知以及行為？其次，透過班級友伴網絡，可以讓研究者得知青少年友伴的「真實的 (actual)」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而非由受訪者自陳「知覺的 (perceived)」友伴的認知與行為。過往的研究顯示採用友伴自答的方式較不會高估友伴的影響力並且可以避免共同方法的效應 (common-method variance) (李文傑，2012)。此外，如果採用友伴自答的測量仍能夠找到友伴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則研究者可對所發現的結果更有信心。

此外，在分析模型中尚納入數個控制變項。**性別、就讀國中或高中、家庭收入以及居住地區**皆為虛擬變項，其中居住地區由三個虛擬變項組成、以北部為對照組。家庭收入以 3 個等第測得，0 為貧困或清貧、1 為普通、2 為小康或富裕，以貧困或清貧為對照組建立虛擬 2 個虛擬變項。**家庭的教育程度**則是由父母的教育年數的平均數測得。最後，為了控制班級的大小的影響力，**班級人數**也納入分析模型中控制。表 1 呈現的是研究變項的描述統計。在資料中，男女各半、有較多的高中生參與以及北部的學校可能過少的情況出現。大部分的家庭仍屬於中等程度的社經位置，而父母的平均教育程度約在專科與大學之間。班級人數的平均數在 25 人，但不同班仍有人數上的變動。

表 1. 研究變項的描述統計 (N=1,126)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51.2
女生			48.8
就讀國中或高中			
國中			48.7
高中			51.3
地區			
北部			13.2
中部			38.5
南部			23.9
東部			24.4
家庭收入			
貧困+清貧			8.7
普通			54.0
小康+富裕			37.3
家庭教育	3.80	1.15	
班級人數	27.58	8.05	
父母負面教養	14.82	4.20	
受害經驗	9.45	1.00	
社區凝聚力	29.94	8.19	
暴力認知	17.64	7.40	
暴力行為			
0			75.2
1			15.1
2+			9.7
友伴暴力認知	46.4	23.8	
友伴暴力行為	1.0	1.6	

3. 分析方法

這個研究探討青少年所處的環境與個人經歷對其暴力行為的影響，並從晚近的暴力認知的概念輔以友伴網絡的分析觀點，來探討友伴的影響力。這個研究使用社會網絡分析中的網絡自我相關模型（network autocorrelation model；Anselin, 1982；Leenders, 2002）。在線性模型的架構下，納入以網絡關係為基礎的加權矩陣，用以討論網絡關係對行動者的影響。依據依變項的分配，這個研究採取 OLS 迴歸來分析暴力認知的影響因素。針對青少年的暴力行為，這個研究以 oprobit 作為分析的模型。在分析中，採取層級迴歸的邏輯逐步探討各因素

的影響。在預測暴力認知時，研究者先探討父母負面教養、社區凝聚力以及受害經驗對暴力認知的影響。其次，納入友伴的影響力，檢驗友伴的暴力認知以及暴力行為對青少年暴力認知的影響。在預測暴力行為時，仍先探討父母負面教養、社區凝聚力以及受害經驗對暴力行為的影響。其次，在模型中納入青少年個人的暴力認知，探討認知因素是否具有中介的效力。最後，在模型中納入友伴的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用以瞭解友伴的影響力。所有的分析皆在 Stata 14.1 進行。由於在抽樣設計上是以班級為單位，為了校正抽樣上的群聚效應，在分析中利用 Stata 的 cluster 與 robust 選項來獲得最佳的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s）。

在資料中約有 30% 的提名友伴為非調查樣本內的青少年。雖然受訪者最多僅提名 4 名班外友伴，絕大多數的人僅提 1 至 2 名的班外友伴。由於，忽略班外提名仍有可能由於班外友伴的情況未被觀察到，而影響到模型參數的估計。為了檢證這個影響性，這個研究先採用 Heckman selection model (Heckman, 1979)。利用人口變項（如性別、家庭教育程度、居住地區等）、個人的網路變項（如個人的網路中心性）以及受訪學生的個人特質（如班級排名、社區特質以及家庭動力等）來建立預測是否提名班外好友的 probit model。利用 Stata 的 heckman 與 heckoprobit 兩個套件分別針對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進行選擇模型的測試。分析結果發現兩個模型的 rho 係數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表示 Heckman 選擇模型的結果與一般迴歸與 oprobit 模型並無不同。因此，在接下來分析中僅呈現 OLS 與 oprobit 模型的結果。

四、結果

1. 影響暴力認知的因素

表 2 呈現的是暴力認知為依變項的迴歸分析。模型一顯示，父母負面教養與個人受害經驗正向的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認知。反之，社區凝聚力具有負向的影響力。青少年處在暴力充斥的環境中更能夠涵養其暴力認知，而處在支持的、互助的環境中，則會降低其暴力認知。這樣的發現初步支持本研究的假設。接著，為了探討友伴是否影響青少年本身的暴力認知，在模型二中納入了

兩個友伴變項。然而，其效果未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友伴暴力認知的影響為 $b = -.00, p > .05$ ；友伴暴力行為的影響為 $b = .24, p > .05$ ）。這顯示在考量了個人所處的環境因素與個人過去經歷後，友伴的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並不會影響青少年本身的暴力認知。

表 2. 暴力認知的 OLS 模型 (N=1,126)

預測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Coefficient	SE	Coefficient	SE
父母負面教養	.22***	.06	.22***	.06
受害經驗	.95***	.22	.93***	.23
社區凝聚力	-.07*	.03	-.07**	.03
友伴暴力認知			-.00	.01
友伴暴力行為			.24	.12
F	18.82***		16.95***	
R ²	.11		.11	

Note: * $p < .05$ ** $p < .01$ *** $p < .001$ ；各模型中皆控制性別、就讀國中或高中、居住地區、家庭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班級人數；模型中呈現的是未標準化的迴歸係數。

2. 影響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因素

表 3 呈現的是預測青少年暴力行為的情形。模型一呈現了個人所處環境對暴力行為的影響。父母負面教養以及受害經驗正向地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但是社區凝聚力對青少年暴力行為並沒有顯著的影響。模型二納入青少年的暴力認知，結果發現在控制住青少年的家庭、社區以及個人經驗等因素後，暴力認知仍顯著的預測其暴力行為。然而，在納入暴力認知後，模型一的預測變項其效力在模型二中並沒有大幅的減低。進一步以 Stata 的 khb 指令來檢定兩個模型中三個預測變項的係數變化，結果發現三者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因此，與理論的預測不同的是，暴力認知並不中介家庭、社區與個人經驗等因素對暴力行為的影響力。模型三納入友伴的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友伴的暴力認知的影響力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友伴的暴力行為則顯著且正向的影響其暴力行為。此外，模型三的結果也顯示青少年所處的環境、青少年的暴力認知與友伴的暴力行為對其暴力行為具有各自獨立的影響力。

表 3. 暴力行為的 oprobit 模型 (N=1,126)

預測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Coefficient	SE	Coefficient	SE	Coefficient	SE
父母負面教養	.03**	.01	.02*	.001	.03**	.01
受害經驗	.24***	.04	.22***	.04	.21***	.04
社區凝聚力	-.002	.005	.001	.005	.001	.004
暴力認知			.03***	.006	.03***	.006
友伴的						
暴力認知					-.002	.002
暴力行為					.11**	.03
Wald Chi-square	95.01		106.94		156.19	
p value	<.001		<.001		<.001	

Note: * $p < .05$ ** $p < .01$ *** $p < .001$ ；各模型中皆控制性別、就讀國中或高中、居住地區、家庭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班級人數；模型中呈現的是 oprobit 模型的迴歸係數。

五、結語

台灣青少年的暴力行為持續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一方面，這是由於校園的暴力事件以及霸凌事件威脅著在校學生的安危。另一方面，早期暴力行為的養成與成年的暴力犯罪息息相關 (Robin, 1978)。近年來台灣暴力事件屢屢震驚社會，針對青少年時期暴力行為形成的研究實為迫切。這個研究從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的上游 (up-stream) 防制的觀點，探討影響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社會因素。

這個研究從 SST 這個晚近整合理論出發來凸顯認知與認知相關概念的重要性。首先，這個研究立基於過往對於認知偏誤以及認知易受害性的研究 (Crick & Dodge, 1994；Dodge, 2006；Wills et al., 2000)，將研究的焦點放在青少年暴力認知對於其暴力行為的影響。接著，這個研究將這些認知相關因素放入晚近發展的 SST 中，用以討論青少年所處的環境對於暴力認知的涵養，進而使其較易選擇用暴力的方式來處理人際的關係而生成暴力行為。此外，這個研究更進一步針對 SST 對於友伴影響討論的缺乏，從友伴網絡的觀點出發，探討友伴的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的影響力。

利用一筆獨特的青少年友伴網絡資料來檢測前述的理論觀點，研究結果有三個主要的發現：首先，青少年所處的家庭、社區以及個人生活經驗涵養了青少年的暴力認知。青少年接受較高程度的父母負面教養以及具有較高頻率的受害經驗，比較會發展出較高的暴力認知。此外，居住在高凝聚力的社區中，青少年的暴力認知則較低。在友伴的影響方面，與研究假設不同的是，在考量了家庭、社區以及個人受害經驗等因素後，青少年結交高暴力認知與高暴力行為的友伴並不會影響青少年本身的暴力認知。這個結果與過往學者強調的觀點相符：有關青少年本身的價值觀以及信念，原生家庭以及父母具有較長遠的影響（呂玉瑕與周玉慧，2015）。

其次，有關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結果上。與暴力認知相似，父母負面教養與個人的受害經驗影響持續的影響著青少年的暴力行為，社區凝聚力的影響力反而消失，這與研究假設不符。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台灣鄰里的住商混居特性與美國的狀況不同，使得社區凝聚力對於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力不若家庭與個人經驗來的重要。此外，這也可能是這個研究受限於資料中有限的測量，無法將社區解組相關的測量納入模型中有關。未來的研究可以在這個部分繼續深究。青少年的暴力認知對於青少年的暴力行為有正向的影響，這個發現符合 SST 的預測。然而，與理論預測不符的是，暴力認知並不中介家庭與個人經驗的影響。不過，在控制了家庭、個人經驗以及社區凝聚力的情況下，暴力認知對暴力行為仍有獨立顯著的影響，顯示暴力認知對於青少年的暴力行為仍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值得後續的研究持續的關注。

最後，在有關友伴的影響上，社會網絡的影響效果模型顯示：與具有較高暴力認知的友伴成為好友並不會影響青少年本身的暴力行為。然而，若其友伴表現出較高的暴力行為，則青少年本身也會有較高的暴力行為的發生。這樣的發現支持社會學習理論中的仿效論點，即青少年不需瞭解友伴的行動動機，只需觀察他們的行為就能夠模仿他們的行為而從事暴力。此外，由於友伴效果的操作化是透過被提名的友伴的 in-degree 與其暴力行為加乘而來的，這顯示如果青少年結交了高人氣的友伴且其友伴具有較高的暴力行為，這將會增加其仿效的可能性，進而增加其暴力行為發生的頻率。然而，由於這個研究所使用的資

料是初入國高中的青少年們，同班同學之間彼此認識的時間不久。這個效果是否隨著與友伴的接觸時間增長與熟識後，仍持續如此，則需要進行持續的追蹤調查來驗證。此外，在最後的模型中，友伴的暴力行為在青少年家庭與個人經驗控制的情況下仍顯著的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這顯示友伴的暴力行為具有獨立的效果。這樣的發現也符合過去經驗研究，友伴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在青春期之後逐漸的重要（Harris, 1995）。這樣的現象是否會持續下去，則有待後續追蹤資料的驗證。

這篇文章是一系列探討暴力認知、友伴網絡與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初步結果。因此，在資料以及分析上尚有許多的限制需要在此說明。首先，由於目前落霞計畫僅完成第一波的資料蒐集，這個研究所採用的橫斷面資料無法回答研究模型中變項的因果順序。在這個研究中，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是依據理論推論而非有嚴謹的長期資料來檢證這樣的因果關係是否為真。有關嚴謹的因果關係檢證將有待落霞計畫後續幾波資料收齊後，才能夠進一步的探究。其次，關於友伴的影響，這個研究所使用的友伴影響模型僅探討友伴 in-degree 為基礎的效果。如同 Leenders 一文（2002）所呈現的，不同的方式來建立加權矩陣可探討不同的友伴網絡效果（如 out-degree、結構等同（structural equivalence）或橋樑（bridge）的效果等）。在往後的研究中，將持續探討這部分的影響與差異。其次，雖然這個研究利用 Heckman selection model 來檢驗提名班外好友的影響，然而，部分班外好友的特質如年齡組成與性別組成，由於測量上的限制無法得知，因此無法納入研究模型中作為控制，此為本研究的另一個限制。在落霞往後的波數已經新增了這部分訊息，因此，在後續的研究中，將可以用更準確的測量來建構研究模型，以檢證提名班外好友是否真的對研究結果有所影響。此外，晚近在分析社會網絡資料時，也特別強調網絡的變化對於網絡中的行動者的影響以及行動者對於網絡有選擇性的建立與變動。特別是這個研究並未能夠排除青少年的「物以類聚」的選擇性效果對友伴的效力的影響。這仍有待落霞計畫後續波數的資料完備後，才能將這些主題納入討論。即利用多波的社會網絡資料並結合 agent-based model 來進行分析，以區辨選擇效果與影響效果以及模型中變項的因果次序。

在考慮了這些研究限制後，這個研究對犯罪學/偏差社會學有關暴力認知的相關理論提供初步的台灣本土證據的支持。研究結果除了再次確認父母負面教養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外，更重要的是，研究的發現更進一步的指出父母負面教養的影響機制可能在於涵養了子女的暴力認知，而這個機制同時受到青少年過往的受害經驗的影響。這樣的結果可以提供家長與學校在處理有關青少年被霸凌或受害的事件時的提醒，即需要注意青少年對於採取暴力手段反制的合理化的想法並予以開導與疏通。此外，這個研究也探索了 SST 這個理論尚未細緻討論的友伴影響，並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觀點提供友伴影響力的初步經驗證據。友伴的暴力行為搭配著友伴本身高的人氣（high in-degree），使青少年仿效其暴力的行為。然而，如同前述，這樣的發現是否在這些青少年之後的發展中仍持續著，亦或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影響效果（influence effect）外，是否仍有可能有友伴選擇或群聚效果（selection or clustering effect）的可能，未來的研究將持續檢驗友伴在 SST 這個理論架構中所扮演的角色。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王浩威，2014，〈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造就了鄭捷這樣一個心理狀態？〉。

《親子天下》網路版：<http://goo.gl/SMKfR8>。擷取日期：2015/10/25。

石友馨，2008，《家庭教養、社區鄰里關係與自我概念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影響》。國立台北大學社會系未出版碩士論文。

吳齊殷與高美英，1997，〈負面教養方式之代間傳承〉，頁 215-247，在《九○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冊》，張苙雲、呂玉瑕、王甫昌編，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吳齊殷與陳易甫，2001，〈家內暴力的成因與後果：以母親為例〉，《應用心理學研究》11，69-91。

呂玉瑕與周玉慧，2015，〈二十一世紀台灣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之形成與變遷〉。《台灣社會學刊》58，95-155。

李文傑，2012，〈偏差友伴與偏差行為：友伴的影響效果確實存在嗎？〉。《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28，119-160。

- 李文傑與吳齊殷，2004，〈棒打出壞子？：青少年暴力行為的連結機制〉。
《台灣社會學》7，1-46。
- 周玉慧與吳齊殷，2001，〈教養方式、親子互動與青少年行為：親子知覺的相對重要性〉。《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3(4)，439-476。
- 翁國峰，2007，〈集體效能對社區居民犯罪恐懼影響之研究〉。《犯罪學期刊》10(2)，115-143。
- 張明宜與吳齊殷，2013，〈友誼網絡中誰的獲益更多？青少年友誼網絡與學業成就的動態分析〉。《台灣社會學》26，97-146。
- 張楓明與譚子文，2011，〈個人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偏差友伴與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關聯性之實證研究〉。《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3（1），133-160。
- 陳建安，2010，〈社會認知評價與犯罪經驗之關係：一項針對不同犯罪類型之比較研究〉。《中華心理學刊》52（3），287-308。
- 謝雨生、吳齊殷與李文傑，2006，〈青少年網絡特性、互動結構和友誼動態〉。《台灣社會學》11，175-234。
- 羅時強、林瑞欽與范兆興，2011，〈殺人犯心理特性之研究：社會訊息處理論之驗證〉，《玄奘社會科學學報》9，55-88。

英文文獻

- Agnew, Robert, 2006, *Pressured into Crime: An Overview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kers, Ronald L. and Wesley G. Jennings, 2015, "Social Learning Theory." Pp. 230-240 in *The Handbook of Crimin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Alex R. Piquero, Wiley-Blackwell.
- Anderson, Elijah, 1999, *Code of the Street: Decency, Violence, and the Moral Life of the Inner City*. New York: Norton.
- Anselin, L., 1982, "A Note on the Small Sample Properties of Estimators in a First Order Autoregressive Mode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023-1030.
- Baldwin, Mark, 1992, "Relational Schemas and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3), 461-484.

- Brody, Gene H, Yi-fu Chen, Velma McBride Murry, Xiaojia Ge, Ronald L. Simons, Frederick X. Gibbons, Meg Gerrard, and Carolyn Cutrona, 2006,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Youths: A Five-Year Longitudinal Analysis With Contextual Moderation Effects." *Child Development*, 77, 1170-1189.
- Brody, G. H., Yi-fu Chen, T. Yu, S. Beach, S. Kogan, M. Windle R. L. Simons, and R. A. Philibert, 2012, "Life Stress, the Dopamine Receptor Gene, and Emerging Adult Drug Use Trajectories: A Longitudinal, Multilevel, Mediated Moderation Analysi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4, 941-951.
- Cleveland, M. J., F. X. Gibbons, M. Gerrard, E. A. Pomery, and G. H. Brody, 2005, "The Impact of Parenting on Risk Cognitions and Risk Behavior: A Study of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in a Panel of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76, 900-916.
- Crick, N. R. and Kenneth A. Dodge, 1994,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 74-101.
- Dodge, Kenneth, 2006, "Translational Science in Action: Hostile Attributional Sty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ssive Behavior Problems."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18(3), 791-814.
- Dodge, Kenneth, J. E. Bates, and G. S. Pettit, 1990, "Mechanisms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 *Science*, 250, 1678-1683.
- Dodge, Kenneth A. and John D. Coie, 1987, "Social-Information-Processing Factors in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Children's Peer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6), 1146-1158.
- Dodge, Kenneth and C.L. Frame, 1982, "Social Cognitive Biases and Deficits in Aggressive Boys." *Child Development*, 53, 620-635.
- Dodge, Kenneth A., Patrick S. Malone, Jennifer E. Lansford, Emma Sorbring, Ann T. Skinner et al., 2015,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 Global Context." *PNAS*, 112(30), 9310-9315.
- Harris, J. R., 1995, "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 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458-489.
- Haynie, Dana L, 2001, "Delinquent Peers Revisited: Does Network Structure Mat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1013-1057.

- Jaccard, J., H. Blanton, and T. Dodge, 2005, "Peer Influences on Risk Behavior: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a Close Frie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1, 135–147.
- Jackson, Corrie L., Rochelle F. Hanson, Ananda B. Amstadter, Benjamin E. Saunders, and Dean G. Kilpatrick, 2013,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 Between Peer Violent Victimization and Delinquency: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U.S. Adolescent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8(8): 1596-1616.
- Kreager, D. A., K. Rulison, and J. Moody, 2011, "Delinquency and the Structure of Adolescent Peer Groups." *Criminology*, 49, 95–127.
- Lee, Zong-Rong, Chyi-In Wu, Yu-Ting Huang, 2013, "Exploring the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Structural Holes in Teenagers' Friendship Networks." Pp. 109-130 in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ast Asian Youth* edited by Chin-Chun Yi, Dordrecht: Springer Publishing Co.
- Leenders, Roger Th.A.J., 2002, "Modeling Social Influence through Network Autocorrelation: Constructing the Weight Matrix." *Social Network*, 24, 21-47.
- Farrington, David P., 1989, "Early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 Aggression and Adult Violence." *Violence and Victims*, 4(2), 79-100.
- Sampson, Robert J., Stephen W. Raudenbush, and Felton Earls, 1997,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277, 918–924.
- Simons, Ronald and Callie Harbin Burt, 2011, "Learning to be Bad: Adverse Social Conditions, Social Schemas, and Crime." *Criminology*, 49(2), 553-598.
- Simons, Ronald L., Yi-Fu Chen, Eric A. Stewart, and Gene H. Brody, 2003, "Incidents of Discrimination and Risk for Delinquency: A Longitudinal Test of Strain Theory with an African American Sample." *Justice Quarterly*, 20, 827–854.
- Simons, Ronald L., Leslie G. Gordon, Yi-fu Chen, Gene H. Brody, and Kuei-Hsiu Lin, 2007, "Identifying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45(3), 481-517.
- Simons, Ronald L., Man Kit Lei, Steven R. H. Beach, Gene H. Brody, Robert A. Philibert, and Frederick X. Gibbons, 2011, "Social Environment, Genes, and Aggression: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6), 883-912.

- Simons, Ronald L., Man Kit Lei, Steven RH Beach, Gene H Brody, Robert A Philibert, Frederick X Gibbons, and Meg Gerrard, 2013, "Differential Sensitivity to Context: GABRG1 Enhances the Acquisition of Prototypes That Serve as Intermediate Phenotypes for Substance Use." Pp. 303-326 in *Genetic Influences on Addiction: An Intermediate Phenotype Approach* edited by James MacKillop and Marcus R. Munafò.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Simons, Leslie Gordon, Ronald Simons, and Xiaoli Su, 2013, "Consequences of Corporal Punishment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ual Outcom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2(8), 1273-1285.
- Robins, Lee N., 1978, "Sturdy Childhood Predictors of Adult Antisocial Behavior: Replications from Longitudi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8(61), 1-22.
- Warr, Mark and Mark Stafford, 1991, "The Influence of Delinquent Peers: What They Think or What They Do?" *Criminology*, 29, 851-865.
- Wei, H. S. and W. Lee, 2014, "Individual and Social Network Predictors of Physical Bully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aiwanese Early Adolescents." *Violence and Victims*, 29(4), 701-716.
- Wills, Thomas Ashby, Frederick X. Gibbons, Meg Gerrard, and Gene H. Brody, 2000, "Protection and Vulnerability Processes Relevant for Early Onset of Substance Use: A Test among 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 *Health Psychology*, 19(3), 253-263.
- Wu, Chyi-In, 2015, "The Impact of Co-evolution of Dynamic Networks upon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ining and Analyzing Social Networks for Decision Support, Paris, France: The 2015 IEEE/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and Mining, Aug 25-28.

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陳易甫				計畫編號：105-2410-H-305-067-SS2				
計畫名稱：被結構的能動性：犯罪傾向知能結構與暴力行為關聯的跨文化研究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陳易甫，2016，〈青少年暴力行為之研究：暴力認知以及友伴特質的影響〉。《社會分析》 13：93-122。		
		研討會論文		2		陳易甫與歐陽以剛，2017，《日常活動的場所特質、場所守則與暴力知能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發表於2017當代台灣青少年與成年初期研究研討會。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2017年5月25-26日。 陳易甫、林桂綉、李俊穎，2018，《犯罪知能結構的變與不變：一個短期追蹤調查的探究》。發表於東吳大學社會學系45週年系慶「區域研究與社會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台北，東吳大學社會學系，2018年10月27日。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 已發表 ☐ 未發表之文稿 ☐ 撰寫中 ☐ 無

專利：☐ 已獲得 ☐ 申請中 ☒ 無

技轉：☐ 已技轉 ☐ 洽談中 ☒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為限）

本研究以定群追蹤的方法、在兩年的期間追蹤了一群台灣的青少年。結合共同主持人先前執行的計畫，共累積5波的長期追蹤資料。最後總計約有1000名的台灣青少年具有完整的長期資料。本研究的執行達到了三個研究目的。首先，以美國發展出的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為依據，蒐集台灣本土的經驗證據進行理論的驗證。其次，本研究更延伸犯罪的知能理論，將其後續結合日常活動理論的論述納入，建立更為完整的理論模型。本研究以此為基礎蒐集相關的資料進行理論模型的檢證。最後，本研究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觀點出發，將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與友誼網絡結合，對該理論進行補充。本研究所累積的長期資料將有助於促進台灣犯罪學與偏差社會學未來在理論上的進一步發展，並以此為基礎與國際研究接軌。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本研究主要發現為：1. 犯罪知能結構適用於解釋台灣青少年暴力與偏差行為；2. 青少年所處的活動場域的風險特質與盛行的規範，影響其暴力行為，並與個人的暴力知能互動；3. 在考量青少年個人的暴力知能結構的情況下，友伴的暴力知能結構與暴力行為的影響力有不一致。友伴的暴力行為扮演的角色較為重要。